

張絢中著

三民主義研究

時代思潮社印行



3 1799 6943 5

## 序 言

中國用以立國的是三民主義。它是一個真理，非常科學，非常進步。可以說，它是集中外古今學說思想的精華而成。不備在抗戰建國的今日是三民主義的世界，將來亦仍舊是三民主義的世界，故具有永久性的。奉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奮鬥不懈，以求實現，已歷數十寒暑，力量只日見其強大，而從未衰弱過。別的黨派，在這個三民主義真理照耀之下，均好像雪遇着太陽，邪鬼遇着鍾馗，一個個遁逃，一個個消逝！抗戰一起，全國人民以及所謂各黨各派，均一致信仰三民主義，即偏執成見十餘年的共產黨，亦於此時，痛改前非，拜倒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不管其有無誠意與否，然三民主義號召力之大，却於此可見。爲什麼？因爲大家都知道，中華民國是國民黨員流血流汗，吃盡千辛萬苦，殫精竭慮所創建的。沒有國民黨，就不會有中華民國；沒有中華民國，也就不會有今日的抗戰。崇德報功，是中華民族固有的美德，三民主義能發揚未已；國民黨能日進無疆，就是這個原故。

從此我們不要存幻想，必須認識中國，勿專做別國主義思想的販子。削足適履，不免於愚妄。這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過去某些人幻念橫行，不知葬送了幾多奮發有爲的青年，不知耗費了幾許國家的財力和

MG  
D69.0-53  
32

物力。結果是招致了國家民族的危機！這是一個血的教訓，同時也是一個最傷心的教訓！

我們得承認思想力量之偉大，三民主義既是一個真理，我們尤必闡揚它，造成思想上的二種熱力。兵法有云：「攻心爲上」。總理亦說：「宣傳工作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工夫」，於此足見宣傳與建國之關係了！我們深深的感覺到，國民黨的理論工作，是做得太不夠了；過去不夠，現在仍不夠。我們必須發揚三民主義的戰鬥精神，用它去批判一切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任何主義思想，發揮出精神的武器作用。尤須展開一個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用這個文化運動去統一三民主義的思想信仰！

至於研究闡揚的方法，我們亦曾說過，最好是取法於馬克思主義者研究闡揚的精神。現在只有馬克斯主義闡揚得最充分，著作之多，大有汗牛充棟之勢。幾乎談馬克思主義者不必讀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但讀二把手以至三把手的即得。其風行全世，真個是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矣！我們三民主義者對此，能不自勉嗎？

抗戰以來，談三民主義的，固不算少；但有一大半是存心歪曲、割裂、穿鑿附會，以快私圖的東西。現在都知道汪逆精衛在敵人刺刀尖上所講的三民主義，乃是偽三民主義，殊不知還有另一種偽三民主義。譬如：三民主義分明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但他們却說是空想，是一種憧憬，否認它的實踐性；三民主義分

明是反對私有資本主義的，但他們却說三民主義的任務就是資本主義；三民主義分明主張全民合作，共同努力於「新共產社會」之實現，反對階級鬥爭、無產專政的方法行之於中國，但他們却說奉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這是略舉數端，大家想一想，這不是偽三民主義的見解又是什麼？

這種內在的偽三民主義理論，還正在生長着，我們徹整三民主義的思想陣容，亟應向它注射清血針！我現在將發表於各雜誌報章上的文字，搜集其一部份編成此冊，目的蓋亦希望能發生點清血針的作用。惟此書既是零文搜集而成。則意思之重複、拉雜而欠系統的地方，自必不免。這點要請讀者鑒諒的！

這些文字之寫成，全由於葉青先生的鼓勵。這書的出版，同樣是由於葉青先生的鼓勵，不是葉先生，根本就不會有此書問世。我在此謹向葉青先生表示誠摯的敬意！至內容當否？尚乞讀者幸進而教之！

一九四〇・四・一・張絢中。

序

言

四

# 目次

一、三民主義底物質基礎·····	一
二、論『一勞永逸』的三民主義·····	一一
三、三民主義的革命論·····	一九
四、三民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	二九
五、三民主義的歷史觀·····	四五
六、「知難行易」與三民主義·····	五五
七、與陳伯達論三民主義底研究原則·····	六八
八、與陳伯達論三民主義·····	八〇
九、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	一〇六
十、民生主義怎樣與共產主義做朋友·····	一二五
十一、孫中山先生的和平轉變論·····	一三五

得頭昏眼花，不知所之！其結果，必然是如莊子所說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得不着結論。

關於這種說法，我們的態度是這樣的：我們承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建立在社會的物質論或歷史的物質論之上，這是共產主義成爲了科學的主義的理論基礎，無可否認。但又要知道，這是反映歐洲歷史發展或社會發展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而不是反映中國歷史發展或社會發展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雖然中國的離不開歐洲的；歐洲的對於中國的有間接的因素作用，然而却亦有不相同的所在。尤其是起自封建社會末期或資本初期的後半部社會的或歷史的物質論不與歐洲相同。這是很顯然的。因爲歐洲的社會發展或歷史發展主要的是如下所示：封建社會——資本社會——共產社會。意思是：封建社會經濟中內在地產生資本社會，資本社會經濟中內在地產生共產社會。馬克思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嚮導共產社會、創造共產社會、消滅歷史上的階級社會的實踐理論。此主義之所以會成爲科學的實踐理論，乃因它是分析資本社會的經濟發展的必然所得出的創造的認識的緣故。而分析資本社會的經濟發展的必然性的，則爲馬克思精心結構的「資本論」。

我所謂歐洲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便是將此種「經濟必然論」擴而充之應用於資本社會以前的一切社會歷史所使然。譬如，封建社會經濟產生資本社會經濟的必然性的認識，便是由於認識了資本社會

經濟產生共產社會經濟的必然性的結果。因此，這種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是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

但這種社會的或歷史的物質論一經確立之後，它又反作用於馬克思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對於此主義的實踐性和必然性，更給與充分的論據，證明它不僅是資本社會發展的必然，而且是整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呢！我們說馬克思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之上，就是指的這種反作用。這樣看來，「資本論」及共產主義，它們不只是客觀的理論和實踐的理論，而且具有方法作用了。

但這個方法性是何自而來呢？最根本的原因就只有一個，即由於歷史發展到了「發現」過去「固定的和深藏的規律」（恩格斯）的時期的緣故。換言之，歷史法則至此，已由「深藏」而日趨「明朗」（我試創用）了。因為已日趨「明朗」，就沒有過去暗中摸索之苦了，何去何從，你可有明白清楚的認識，自由自覺的計劃去支配「歷史的客觀力量」，而不再為「歷史的客觀力量」（恩）所支配。「資本論」便是分析此「明朗」的客觀事實的東西；共產主義便是根據此「明朗」的客觀事實而創造出的自由自覺的主義。因為歷史道路至此已「明朗化」了，用它去看過去的「深藏」的歷史道路時，亦就毫髮畢露。方法性便是這樣建立的。還不止此，因為「明朗」的事實，不僅建立了方法性，而且也建立了主義的一勞永逸性和

主義的科學性。誰都知道，沒有這個『明朝』的事實，一勞永逸的主義思想無由產生，科學的實踐理論無由成立，像過去的主義思想和理論之成爲了『虛花』（恩格思）不能結實，就是因爲那是處在歷史的『深藏』階段，『明朝』階段沒有到來。

所以，『明朝』的歷史事實，是決定主義的『一勞永逸』性和科學性的根本原因，是認識上的一個標準，有辨白是非真偽的測量作用。

馬克思社會主義既然是根據『明朝』的客觀事實而創造出的自由自覺的主義，所以照着此主義所指示而去創造的共產社會，它不會再孕育反對它的別的社會了。換言之，它不會變成別的社會的支配者，即別的社會的『歷史的客觀力量』了。乾脆些說，它以後不會再有別的社會形態，這個社會即是一個『一勞永逸』的社會。

本文是在論究三民主義的物質基礎，我爲甚麼一定要費許多筆墨來談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呢？意思也不過是在這點：即證明三民主義的產生時代，也是處於歷史法則的『明朝』期而已。因這『明朝』期，不僅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一勞永逸』性和科學性的事實根據，而且也是三民主義的『一勞永逸』性和科學性的事實根據。承認了前一個，就不啻是承認了後一個。否則，那就說不通！因爲站在一般的立場

來看，這兩種主義所處的時代是相同的，即都是處在資本社會末期或資本社會初期的延續的掙扎過程中。其不同之處，是由於國別地看的結果。這也是事實。很顯然的，三民主義沒有內在地直接通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比共產主義會直接進過的自不相同。但這不礙於三民主義的「一勞永逸」性和科學性，因為三民主義的「一勞永逸」性和科學性，不在是否直接通過資本社會，而在是否處在世界歷史的「明朝」期和是否間接地、精神地通過了此「明朝」的事實。這是應該充分注意的。

我們說中國是由封建社會而民生社會（或三民主義社會），乃是單就國內歷史的發展聯繫而說，實則，這個民生主義的物質的社會基礎，雖是直接建築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末期）上，對於民生主義有內在的孕育作用，但此內在的作用中能產生出這個「一勞永逸」的主義，却是由於外在的事實（歐洲資本社會）在內在的事實上起着作用的結果。詳言之，中國之能跳出資本階段而產生一個民生主義的「一勞永逸」的思想，乃是由於內在的直接性和外在的間接性相互作用所構成。再詳言之，「一勞永逸」的民生主義思想，乃是由於中國內在的「深藏」的歷史事實和歐洲外在的「明朝」的歷史事實所交互融合所致。

因為這種關係，故中國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主要內容，不是由封建而資本而社會，而是由封建而民生。因為歐洲的「深藏」的歷史道路已趨於「明朝」化，這「明朝」之光，就把尚處在「深藏」的歷

史道途中的中國照『明朝』了。這真算得是沾了歐洲的光呢！

當然，如我所曾說過的，倘後進國對於這些先進的『明朝』事實，看不透，理解不到，不知自覺地去接受它、借鑒它，那末亦將等於零！不過，民生主義却正是自覺地、意識地吸取了這『明朝』的教訓，絕非空想，尤非暗合。我們要證實這點，不妨讀孫中山先生這段話。這段話即：『人的眼光，要看得遠。凡是大禍災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它是容易的。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他，卻是極難。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在幼稚時代，但將來總是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不得已纔用，不可煩煩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算是最大的責任』。

這段話中謂『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意思是說歐美資本社會的罪惡，已經發展到『富者極少，貧者極多』的階級對壘境地，因而沒有方法可防止，階級鬥爭的社會革命是必然不可避免。這是『明朝』的社會現象，給中國將來走到大同世界的一個『明朝』的教訓。這教訓叫我們去『防患於未然』。因為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在幼稚時代』，要『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是『容易』的。這不看出民生主義是中國內在的『幼稚』事實和外在的成熟事實的教訓相互作用的結果嗎？

從而可知，如沒有內在的「幼稚」事實，外在的成熟事實的教訓不成其爲教訓。反之，沒有外在的成熟事實作教訓，內在的「幼稚」事實，不會成爲「一勞永逸」的民生社會的社會基礎。但因爲這個先進的事實是外在地存在着的，只精神地間接地存在於中國，故只能說中國是由封建而民生，而不能說是由資本而民生的。

因此，社會的物質論或歷史的物質論有兩種，卽三民主義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與共產主義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

三民主義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必然是以實現民生主義爲目的的，在於說明中國由封建到民生的社會的物質基礎或歷史的物質基礎，卽說明這些物質基礎的中國性和歐洲性，以證明民生主義是中國的實踐的社會物質論。

某些社會主義者也許要說：三民主義雖有其社會的或歷史的物質基礎，但此種物質論並不合於辯證法。

其然？豈其然乎？我們不能因爲中國沒有資本社會，就說三民主義是非辯證法的。上面已會道過，中國雖沒有資本社會，但歐洲的資本社會却是精神地、間接地通過了中國的民生主義，只不過事實是外在地

存在於歐洲罷了。圖示其關係是如次：



但圖中的歐洲資本社會，是指的末期的資本社會；而資本末期業已反映出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因此，說三民主義是精神地、間接地通過了歐洲資本社會，同時也就表示通過了歐洲的科學社會主義，這是應聲明於此的。

如上所分析，不看出民生主義是物質論的嗎？因為它是『以英美爲鑑』，『由科學之理則』所『求得（的）真知』，『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是『把社會的情狀和社會的進化研究清楚了之後』所創造出來的主義。孫先生雖特別看重『道德心』，但他不超事實地去追求它。其主張革命，主張奮鬥，要『節制資本』，要『打倒資本制度』，就是頂好的證明。如上所分析，又不看出民生主義是一勞永逸性的嗎？因為它同馬克思社會主義一樣，都是處在歷史法則的『明朝』期，對於歷史的趨向，看得甚是明白，所以由此構成的主義，可以一一付諸實踐，它要進而支配『歷史的客觀力量』，不再爲『歷史的客觀力量』所支配。

總而言之，民生主義是物質論，十二分的科學！

某些社會主義者，說三民主義是『唯心』的，顯然做了機械論的俘虜！他們的頭腦，爲歐洲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所包辦，獨斷了！因而不知道中國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之存在。當然更不知道三民主義以中國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爲基礎那一回事。

某些三民主義者，說三民主義是『唯生』的，當然比前一種人進步。因爲他們底目的在於要跳出歐洲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的包辦和獨斷，衝出機械論的氛圍。然而只講唯生論，反是讓歐洲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以包辦獨斷的機會。其不知有中國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則與前一種人同。

怎樣呢？我以爲必須把中國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提出來，用它去對抗歐洲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換言之，即用三民主義的社會的或歷史的物質論，去攻打共產主義的社會的或歷史的物質論的包辦性和獨斷性，要達到使社會的物質論或歷史的物質論爲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所分「辦」、分「斷」的，以實行平分世界！

世界平分的目的達到了，然後說三民主義是物質論的亦絕不會誤認是共產主義的物質論。同時，從前內圍於『獨斷』和『包辦』的成見而說三民主義是唯心論的人，也一定要掩旗息鼓！因爲說三民主義是唯

心論的，是由於只知有共產主義的社會物質論或歷史物質論所使然！

一九三九，七，二四於北碚夏溪口

## 二 論『一勞永逸』的三民主義

『建國大綱』第二條有云：『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真的，食衣住行是人類生活四大需要！這些需要沒有解決，就不能說是實現了民生主義。

人類的一切作爲，一切活動都是爲了生活；沒有了人類的生括要求，可以說就不會有歷史。孫中山先生說：『吾黨之責任，蓋不卒於民族主義，而實卒於民權、民生主義，前者爲之始端，後者其究竟也』。又說：『我的革命，是爲民生主義而革命』。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因實現民生主義才是革命的最後的目的，民族、民權，要不過是實現民生主義的開路先鋒和奠基石而已；在這裏，很明顯，革命是由生活出發。

蔣總裁看清了這點，故亦說：『我們無論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軍事那一方面之一切努力，都應該以民生爲主要的目標。全部三民主義雖分爲民族、民權、民生三部分，最後實在可以歸結於『民生』

」。又說：「我們要認定：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在建設民生，爲人民謀福利，舍此而外，便別無所謂政治」。

三民主義的創造者，是這樣地着重民生主義；蔣總裁也是這樣地着重民生主義，而自總理逝世以來，蔣總裁成了唯一的實行領袖，那末，將來的中國，就必然是一個民生主義的中國了。

蔣總裁以三民主義爲實行的指標，而三民主義的創造者則曰，三民主義的革命，是一個「一勞永逸」的革命。那末，將來三民主義成功後的中國，就必然是一個不會再有革命的中國了。

現在有些所謂社會主義者，認爲這個「一勞永逸」的革命，是民主革命階段的思想領袖對社會前途的「直線」的看法，來自幻想。因此這個「直線」式的思想，一定會爲事實粉碎而爲「曲線」的。

究竟這個看法對不對？我們豈不能不對民生主義的發展過程加以考察，看它到底是來自幻想還是來自事實。這個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要不然，我們對於這個三民主義的革命便要冷了半截的。爲甚麼呢？因爲它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革命啊！誰說有它的進步性，但究竟進步得不徹底！繼三民主義革命之後，還須再來一個革命才能達到「永逸」的境地，這不就是不徹底的證明嗎？

首先我們得承認，孫中山先生從首倡革命之乙酉年起至甲午、乙未之十一個年頭間，他的革命思想

、確不是「一勞永逸」的革命思想，可以把他的思想完全劃歸給民族革命乃至民權革命之範圍內。雖然其目的也是在「民生」，不過，那時候所注意到的民生，只是欲使人民的生活從專制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達到自由的目的而已。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民生思想，毋甯說是一般民主革命者口中的民生思想。其目的僅在「國家富強，民權發達」。這是有文獻可考的，不必諱言。

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那時的民族思想，沒有注意到將來的民族界限之必須打破；那時的民權思想，沒有注意到歐洲民權主義之虛偽成分。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會誕生社會主義的民生思想。

這是甚麼道理呢？告訴大家：這是純中國的客觀事實決定着的思想。用孫中山先生自己的話來形容，則由於只「內審本國之情形」而沒有「外察世界之大勢」之結果。使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尤其是民生思想起着質的變化，並表現出批判的精神的，是在甚麼年代呢？是在倫敦避難以後。這點，我們可從「知難行易」的「有志竟成」一章看出來的。他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所由完成也」。

這是孫中山先生跳出中國的落後事實，站在歐洲的進步事實上的覺悟的意識之一結果。在這個時候，他覺得創造主義，不應以中國的單獨事實自劃自限，須用歐洲的事實作觀點去看出中國的未來的肖像。所謂『思患預防』的和平轉變思想，便從這裏萌芽滋長。我在別一篇文章上說三民主義是兩個事實的綜合，道理亦便在此。所以你能把眼睛張開一點，看遠一點，則馬上會覺得三民主義的思想是來自事實，從而一勞永逸的革命根據固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了。總結一句，一勞永逸的三民主義革命，不是幻想，相反，它是時髦而且科學！

孫中山先生既然有了民生主義思想，且此民生主義的目的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相同，那末，邏輯所及，對於原來的民族思想、民權思想當然亦不能感覺滿足了，因為啓示孫中山注意『民生問題』，既『是……歐洲……社會革命之運動』，而此『社會革命運動』的國家，其民族思想、民權思想却都是異常發達的，然而，竟仍不免於有『社會革命之運動』發生於其間。由這一點，使他感覺到歐洲民權主義之虛偽，故他說：『現行代議制度，已成民權之弩末，階級選舉，易爲少數所操縱』，殊非『民權之真義』。爲了針對這點，他便主張『直接民權』，力倡『全民政治』。

在這裏，他批判了本義的民權主義。

既然，民生主義的目的與社會主義相同，則民生主義便不能不主張世界革命，打破民族界限了。至此，本義的民族主義自然不免又有缺點了，因為民族主義是「大同主義」的障礙。爲了這點，孫中山先生便把「民族主義」看作講「大同主義」的「基礎」去了。

在這裏，他批判了本義的民族主義。

甚麼是他的批判武器？民生主義！這樣一來，孫中山先生的整個思想都完全變質了。現在留給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變質」以後定型化了的思想。於是，他反對「亦步亦趨」，主張「迎頭趕上」：他反對全盤西化，主張綜合中外。

誰也知道，孫中山先生是高調「民生」的。所以，一旦覺得有解決「民生問題」的至善途徑時，他馬上就去師其意，想出方法。及到覺得自己的民族思想、民權思想有礙於「民生問題」之解決時，他便馬上改變它充實它。對民族主義不存褊狹之見，對民權主義不滿足於它的階級性，這不就是好證明嗎？

現在有許多所謂社會主義者，不理解這些，始終肯定三民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理論，把民生主義中那些有關理想社會的話，認爲是從幻想出發；沒有事實的根據。這是非常錯誤的！

三民主義之有事實的根據，上面已會道及。現在我們還可從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上，看出它是一個「

秀永逸的思想，並且是孫中山先生很肯定很成熟的見解。如果見解不成熟、不肯定，三個主義之間，必不免於衝突。假使事誠如此，我們還可認爲孫中山先生的社會思想是不完全的東西。然而竟不然，他不僅對社會主義有深切的理解，並且能使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不與他的社會思想相衝突。有些社會主義者對民族主義無法駕馭，而他却能利用它作爲講世界主義的基礎，這即是一個切例。

有人說，民主主義是社會政策。又有人說，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這些說法的錯誤和歪曲，可不必用民主主義的邏輯來駁斥，只須乘之以民族民權的邏輯即夠打擊他們了。請問：主張社會政策、主張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民權主義上會反對階級選舉、批判代議制度嗎？又請問：主張社會政策、主張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民族主義上會主張將來消除民族壁壘，打破種族偏見，實行『大同主義』嗎？如社會主義者不會歪曲到把帝國主義者口中的侵略主義當作孫中山先生的『大同主義』看，則說民主主義是社會政策是資本主義的人，豈不是瞎鬧嗎？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爲甚麼會有批判社會政策、資本主義的能力呢？就因爲這種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不是原來的、本義的了。相反，它是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同時，也即是我所謂三民主義的整個精神是民主主義的精神的理由所在。

把這些瞎說肅清了，我們乃知道，所謂「建設……民生」，既不是單建設無產階級的民生，也不是單建設資產階級的民生，而是遵循中國社會主義（民生主義）於階級不分明之時去開始建設「全民」的民生。

這層，我們可從民生主義的性質中看出來。

民生主義是中國的資本主義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它的特色是在乎它的二重性。沒有了此二重性，就沒有了民生主義。就資本主義一義說，它不是本義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地講求發達資本之道；就社會主義一義說，它不是本義的、典型的馬克斯社會主義，因為它是資本主義地講求共產之道。即是說：民生主義主張資本主義地共產，共產主義地資本。詳言之，民生主義主張發達資本不要妨礙到和平地共產；主張共產不要妨礙到和平地發達資本。我們要了解民生主義的用心，孫中山先生下面這段話算是最中肯要了。茲錄出如次：

「歐美經濟之患在不均，不均則爭；中國之患在貧，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則仍不免於爭，故思患預防，宜以英美為鑒，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及關於社會經濟一切問題，同時圖適當之解決」。

有些人不明此中關係，看到民生主義主張發達資本，就說它是社會政策。這都是「是——是」「否——

「否」的形式翻轉作祟使然。不能融貫它們三者的關係，惟知斷章取義的人，他們老死也不會懂得民生主義的性質。

要知民生主義是綜合的主義，它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均曾與伏赫變地吸收過來。這好像青紅二色相和變成了紫色一樣。但紫色就是紫色，你不能再說它是青色或是紅色了。民生主義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亦然。

### 三 三民主義的革命論

孫中山先生偉大的地方，當然多得不可勝數，但我覺得最偉大的，是在於他獨立了一個「迎頭趕上」的革命理論。這個理論，真是非同小可，值得稱頌，值得闡揚！

「迎頭趕上」的意義，非常明白，它是反「亦步亦趨」的，即反「尾巴主義」的。換言之，迎頭趕上的革命論，不同於「亦步亦趨」的革命論，亦即不同於「尾巴主義」的革命論。這些都是它所反對的。

爲甚麼？因爲「亦步亦趨」，是愚蠢的經驗觀點，是張眼跳岩的辦法，荒謬之極！何以說這是張眼跳岩的辦法呢？因爲在歐洲自然生長性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產生了跳岩的事實和跳岩的理論。但這是必然的，非張眼跳岩可比。這就是說，歐洲這種跳岩的辦法，是來自無意識的活動，出於不得已，並非預知有岩而後去跳的。以此，這種跳岩出險的革命理論，在它們那些國家，不能指責爲「亦步亦趨」或貶之爲「尾巴主義」。否，在它們那裏非常需要，有事實的根據，可以實踐：雖然跳岩是危險的事，但却是出險的唯一方法。

我們知道，歐洲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他的目的是在建設一個永久的人類最幸福的理想社會。然其結

果，却造出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對壘形勢！雖說社會對壘加強之原因，有許多地方要歸罪於後代的資產階級。何以呢？因為他們確曾明知故犯造成許多社會罪惡，不過，這也是在社會對壘日漸彰明時候的事。換言之，這有意是來自無意，即無意識地造成的有意。因此，一般的說起來，歐洲由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其間這個流血暴動的階級鬥爭的革命的岩，自它們資本主義社會的創始人看來，還是出於意外。這即是說，歐洲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並非明知有岩而故蹈，亦非曠使後輩去跳這個岩的。此理至顯然，不用多說。

在中國則不然了。我們如仍主張去照先進國發達資本的辦法去發達資本，這却變成了張眼跳岩了。就先進國的歷史發展事實來看中國，現尙處在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中。但中國情形特殊，因此，正確的說來，中國現在是處於由封建階段到民生階段的過渡中或民生階段的初期中。所謂民生階段云者，是三民主義階段或民生主義社會階段的意。依孫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既然如此，那末民生階段以後就不會再有歐洲由資本階段所產生的社會階級了。因為民生主義澈底實現之日，即是中國共產社會出現之時。

但，這個民生主義的共產社會，是建築在「發達資本」的豐富的生產基礎之上的。說得明白些：要實

現民生主義的共產社會，還得民生主義地去發達資本。於此可見，民生主義它有兩個任務：一是發達資本，一是實現共產，它的特色也就在把兩個任務包括於一個主義中。因為有這個特色，故中國由發達資本到實現共產的當中，就沒有了革命，怪不得孫先生說三民主義的革命是『一勞永逸』的革命了。

何以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總理語）呢？就是在：三民主義雖主張發達資本，但不『亦步亦趨』的跟着歐洲發達資本的舊路——私人資本主義——走，不做它的尾巴主義者。所以，這是一個迎頭趕上的革命論！主要是吸取歐洲跳岩的教訓，防患於跳岩事實未形成之前，如果別個根據他的經驗告訴你說：由此走去前面是一個懸岩，很危險，而你却偏要走去，不想法迴避，這個人，那就未免有點麻木不仁！

對於這些人，孫先生責難道：『現在留心社會情形的人，多說中國目下沒有資本家，用不着講『社會主義』。又有許多人說：等到有資本家發生了之後，再去講『社會主義』還不為遲，這是太不得要領了！像以這樣見解的人來講『社會主義』，難怪他們看着『社會主義』還是前路茫茫，不知從那裏下手！』本來，說『中國目下沒有資本家，用不着講社會主義』，這在原則上是對的。資本家在歐洲發達了資本，提高了生產，但造出了無產階級；中國『目下』雖『用不着講社會主義』，然不能不發達資本。這個『不能不』，不取決你主觀上的願意不願意和知足不知足，這些都是閒話，你如要生存，要在國際帝國主

義之中求生存，你便不能不發達資本。近代的戰鬥武器，是工業資本發達的產物，因此你要排除國家獨立自由的障礙，保障國家獨立自由的實現，也就不能不發達資本。同時，在此世界大通的今日，資本發達之圖的一切生產品，都誘致了有錢的人們去向它購買。有人說，中國過着十八世紀的生活，享受着二十世紀的文明。這是非常危險的。

總之，「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必須進行」（總理語）。今日朝野上下，各黨各派也都一致承認發展工業之重要性，這當然是好現象。但對於發展中國工業之發達資本的方式問題，却是異說紛紜，言人殊。

實則，這是一個毫不成問題的問題。爲甚麼呢？因爲 孫中山對於這個問題，老早就提出了正確的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是唯一的、是破天荒的，開歷史的創局，不容置喙！中國欲求生存獨立，並進而達到「濟弱扶傾」的大同世界的目的，便只有這一條路。這條路之實現，完全決之發展中國工業的方式上，它是存亡所繫，一點不可馬虎放過。

甚麼是發展中國工業的最好方式呢？民生主義的發展方式。依這方式走去，中國工業發展了，却不會產生「壓迫的資本家」（總理語），而可以一路滔滔的走入「新共產社會」（總理語）。用的方法，是「

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二者。但這亦祇是消極的，其作用只在防止『壓迫的資本家』之成長而已，要發展中國工業，這當然不是積極的辦法。積極的辦法，是『國營實業』。亦惟有國營實業才能達到『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目的，使『壓迫的資本家』不發生、不坐大，所以，它才是積極的，有方法的作用，用它既利用了私人資本又節制了私人資本，真是一舉兩得。

有人懷疑國營實業之結果，難免不產生壟斷獨占的官僚資本主義，未必利益會普及全民，實行共享的。這點，我看倒用不着懷疑，帝國主義的戰爭、民權主義之發達，蘇聯的影響，固有道德的提高，都將作用於國營實業，且必然作用於它。

現在的抗日戰爭，雖是中國存亡的關鍵，但獨立自由以後，在此帝國主義世界，外患仍將不免。這即是說仍不能不團結全國，發達生產，充實國力，以謀應付今後的外患。分裂種因於經濟，將來爲了團結國家力量，必然也使經濟利益日益走上『共享』的途途的。

不注意這些環境和事實，不注意民生主義的目的意識性和科學性，就貿然主張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這種見解大可非難，因它有害於中國工業之發展。

中國經濟落後，必須迎頭趕上去，把兩步併作一步走。否則，一輩子在後面，甚至還要作『強權』國

家的租上肉，因而延長了「強權」國家的壽命，遲滯了人類解放的車輪。

要不這樣，便只有竭力避免可以避免的一切矛盾，使中國工業順暢無阻地發展，欲達到這個目的，惟有借鑑歐美，而當不可如有些人所說的實行「全盤西化」。因「彼西方文明之路徑，是一未闢之路徑，即不啻如哥倫布初往美國之海程，猶人行黑夜之景況。中國如一後至之人，可依西方已闢之路徑而行之。此所以吾等從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預知其彼岸爲美洲新大陸而非印度矣，經濟界之趨勢，亦如是也」（總理語）。

因此，歐洲發達資本產階級對立的舊方法和進行共產社會之無產專政與暴力革命，我們便都應該設法避免。中國是一「後至」的國家，現在既知歐美發達資本的結果，不是全民的利益，而是少數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並造成了階級的互鬥以至流血犧牲的慘劇，我們便千萬應該另想一個發達資本的方法，使其利益不歸於少數資產階級而歸於全民，互鬥的慘劇從此根除，把社會弄到「一勞永逸」的境地。

民生主義便是走這條康莊大道的明燈！中國必須走這條路，應該走這條路！其餘的，都是此路不通！這樣，便有數不勝數的好處。舉其牽牽大者如次：

一、資本發達了，沒有受資本的害；

二、因爲沒有受資本的害，故發展迅速，毫無阻礙，

三、舊既沒有，阻礙亦除，階級現象，只有日益消失，不會日益壯大和對立；

四、這樣，便日趨於「新共產社會」，階級鬥爭的社會革命就沒有了，和平地走到了理想社會；

五、因此中國的革命，是一個「一勞永逸」的革命，用「迎頭趕上」的精神，避免了歐洲的「二次之革命」；

六、「二次之革命」既經避免，「濟弱扶傾」的羽翼，必日漸壯健，實踐時間亦必提前；

七、中國沒有「二次之革命」，一經獨立便再無機會給「強權」國家侵略了；

八、強權國家既無由侵略，市場便狹窄，矛盾便日趨崩潰瓦解之過程，因以加速；

九、中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它獲得了獨立自由，是人類解放事業上的最大力量和最大的號角；

十、並進一步暨立民族國際的義旗，先把東方弱小民族一個一個的從強權國家的虎口中救出來；

十一、要它們這些國家跟中國一樣去實行三民主義，照民生主義的辦法，去發達資本，造成一個一個「一勞永逸」的社會，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紛爭與矛盾，提早充實實現大同世界的革命力量；

十二、情勢發展到了這個程度，強權國家與強權國家之間的矛盾和裂痕必難調和。同時，力量亦隨之飽

滿；

三、這時：便可以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互助的國家，『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總理語）的『強權』（總理語）勢力與壓迫階級；

四、『強權打破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便可以講世界主義』（總理語）了。

這些好處，只有根據三民主義去實現『一勞永逸』的革命，去建設『一勞永逸』的社會。否則，不僅大同世界的前途，渺茫得很，即中國真正的獨立自由，亦將還成問題呢！這些果成問題，則強權國家的氣概必更震盪，被壓迫階級和弱小民族的痛苦，必有加無已，人類的曙光，一輩子也不容易出現！而主張在中國『亦步亦趨』的去發展歐洲的資本主義的，以及主張在『資本主義發展了之後再來講社會革命』（總理語）的中間是權殘（不管主觀上是否有意）此人類曙光出現的罪魁！

這點怎講呢？

因為作此而這種主張的人，都是『亦步亦趨』的革命論者。依他，中國由封建階段到民主階段要有一個革命，將來由民主階段到社會階段還要來一個革命。現在先進國已發展到了社會革命階段，產生了社會主義。但先進國發展到這個境地，其間相距約有百年上下，社會主義者既看不起資本社會，故他們在後進國，便變成了不近人情的急激份子，資本階段還未生根立住腳，他們便要來個社會革命。這樣，必然造

成混亂，國家莫由建設，產業莫由發達，力量莫由集中，帝國主義乘機侵吞，結果必會歸於盡，大同世界的前路，始終會理不出頭緒來！

所以，中國要有出路，世界要有救藥，必須大家誠一致地信仰「勞永逸」的革命理論，建設「勞永逸」的民主主義社會，放棄其一切「亦步亦趨」的「二次革命」思想來「共信」三民主義！它是救中國的真理，也是救世界的真理！倘不然，各懷一個見解，各抱一種主義，必然同牀異夢，建國的力量總之都集中不起來，殊不是好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迎頭趕上，已假費力，那有把時間讓其虛度了的道理呢？

中國如有了堅持「二次之革命」（總理語）的社會主義者，就口頭上承認現在是資本主義階段，亦必因有社會主義的觀點而對於發達資本的事業抱着徘徊觀望的態度。在從事於發達資本，雖他的目的不在賺錢而在發民，然有捉着黃牛做騎的社會主義者在，亦免不了畏首畏尾，不起勁，這樣一來，前途就顯難樂觀！

孫先生說得好：「人家造成一所房子，都很想安安靜樂住過一世，不是今天造好了明天便把它拆掉。我們革命也是一樣的道理，不是今天革命明年又來革命。革命要用徹底的方法，才可以享永久的幸福。」

果不然，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便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這三個問題如果同時解決了，我們便可以享永久的幸福。」。

又說：「中國實業發達以後，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民，固必然之勢，若不預防，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歐洲當二百年前，爲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來，爲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倡導三民主義。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便當自覺，因彼於政治革命成功後，不計及社會革命，故有此弊」。

從這些話句看來，已無疑義，三民主義是「一勞永逸」（總理常用此語）的革命主義。再說一遍，主眼跟着歐洲「亦步亦趨」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和主張「資本主義發達了之後再來講社會革命」的，都是二次革命論者，與三民主義的「一勞永逸」的革命殊不相容。

其次「二次革命」的觀點，不是「迎頭趕上去」的方法，而是「向後跟着」歐洲跑。孫中山先生的「一勞永逸」的革命論，才是「迎頭趕上去，不……向後跟着」歐洲跑的「後來居上」的主義，是絕對創新的！這便是孫中山先生獨特偉大的地方，爲天才的表露！

## 四 三民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

### 一 高舉眞理的義旗

三民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有什麼關係呢？一般人都把三民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看成互不相容的對立物，決了以爲要圖明三民主義使人信守不渝，頭一個辦法，就是無情的批判馬克思社會主義，尤其是要批倒那衆所稱謂的科學的地方。換言之，要把科學的社會主義批判成非科學的，令它與空想的社會主義相處不寧，這才算奏了奇功，收了巨效！

這種態度對嗎？不對得很，而且根本錯誤！因爲中國之需要三民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之爲科學的並無妨礙，不但無妨礙，且可從馬克思社會主義之科學性中看出三民主義之科學性，在加強三民主義之信仰上，大有裨益。而一般的說起來，則三民主義根本就沒有與馬克思所指出的歷史法則相背反，孫中山先生主張的『將來』之產，贊成『回復到新共產時代』，不就是很好的證明嗎？自然，三民主義有它特殊的偉大處，與從後面當詳論。既然這樣，那末一般人籠統地去批評馬克思社會主義，說三民主義與它是絕然兩

物就不錯罷了嗎？他們錯誤的原因在那兒呢？讀書沒有融貫的理解固是其一；還有一個，甚至是最主要的「僑」那便是「始作俑者」的中國共產黨了。何以故呢？因為他們這些紅色買辦不顧國情，否定馬克思之科學的教言，機械地把馬克思社會主義搬到中國來盲動了。不過，這也不能怪馬克思社會主義之不科學，只怪得冒稱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新牌貨物的總機關第三國際之糊塗！因此，這已經是空想主義者的行徑了，我們要否定它，只須指明他們不合馬克思之教言而為空想主義者就得了，並不必在馬克思本人頭上動腦。可是，一般人又素無研究，於是把空想主義者之荒謬當作了馬克思社會主義之錯誤而大肆攻擊。誰知這是落了空呢？

但，以全力來為三民主義而說話的某些人，他們果真就完全懂得了三民主義嗎？沒有！批評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不完全懂得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證明。且因為不懂得馬克思社會主義又遺忘了，歪曲了三民主義的許許多多的正確性。他們只知道孫中山先生曾批評過馬克思社會主義，却並不知道是站在甚麼場合批評，於是鬧出一些的笑話，矛盾層出不窮。

我們現在要糾正一切對三民主義、對馬克思社會主義之錯誤殘缺的見解，發現它們之間的合理的核心，高舉着真理的義旗！

## 二 衝出迷魂陣

孫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

這話國民黨人多不願提出來說，以為一說是可以為共產黨張目的；因此，共產黨見了這話即得意。其實，這都是不對的。民生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雖俱為「共產主義」，但在時間上、空間上、方法上各方面說來，都有着差異。就時間性上說，馬克思社會主義是「現在共產主義」，三民主義是「將來共產主義」；就空間性上說，馬克思社會主義是先進國的，三民主義是後進國的；就方法上說，馬克思社會主義主張階級鬥爭，三民主義主張和平轉變。所謂相同，僅僅是就最終的目的這一點而說。同時，所謂差異，亦是就事實上指出，並無是非的主見存乎其間，因為三民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各有其宜，未可一概而論。孫中山先生很知道這點，故他並不把他和平漸進的共產方法要先進國也來效法實踐，他說中國的情形特殊，我固不能強人同我，人也不能強我同人。這是很客觀的態度，值得我們注意。他因為態度很客觀，故常以中國為立場時，就反對階級鬥爭，非難現在共產；一句話反對馬克思社會主義。但當他設身處地以先進國為立場時，他便贊成階級鬥爭，承認現在共產；一句話，擁護馬克思社會主義。這是很懂得一般與特

殊的道理的。可是，在一班不懂此種關係的人，把他弄得頭昏眼花了，好像是跑到了迷魂陣中，只覺其到處矛盾，找不到一條正當的出路，真是哀哉！

關於孫中山先生站在前種場合而反對馬克思社會主義一事，此盡人皆知。但假如你對他們說：「馬克思社會主義之階級鬥爭論並不錯誤呀，孫中山先生都稱許過呢！那他們的答覆一定是：甚麼話？孫中山先生是徹底反對馬克思的呀！你不看見他批評馬克思不懂進化的重心，是『社會病理家』，說他只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嗎？」

是的！但這些批評的真實意義究竟在那裏，恐怕一般人也祇是『讀書不求甚解』，莫明其土地掌！但不管它，先且引一些使他們覺得矛盾而無法解說的話來抵塞一下吧。孫中山先生說：『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以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它；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這一段話，把孫中山先生對馬克思社會主義所取的态度，完完全全地表白出來了。一般無條件地反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人，說馬克思社會主義不科學的人，在這裏，正在向孫中山先生進攻呢？不信，你只想一想：『在不均的社會』『可以……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它』，這還不表出階級鬥爭論之有科學性嗎？這還看不出孫中山先生贊成階級鬥爭嗎？但這是站在先進國的場合說的。一站在中國의場

合，就完全不然了。他說：『在中國……階級鬥爭，無產專制使用不着』，僅能主張『師馬克思之意』，不用馬克思之法。甚麼是『意』？中國將來實行共產；甚麼是『法』？不用階級鬥爭，首先就『思想預防』，以期和平轉變。

這是孫中山先生天才的表露！看不出孫中山先生此種天才表現的人，讀了那一段話就必定是進了迷魂陣中一樣。

或曰：我們並不否認馬克思社會主義在先進國之實踐性，不過它並不是科學的罷了。果然，這又成甚麼話！難道實踐性與科學性可以分開來的嗎？甚麼叫做科學性？簡言之，就是根據事實立論，不作空想。把理論與實踐統一之謂。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既能實踐，即是理論與實踐統一之證明，這怎麼能說不科學呢？難道要理論與實踐不相符合，才是科學的了嗎？這簡直是笑話！這猶如說三民主義理論很合中國的特殊國情，可以實踐，不過並不科學罷了，是同樣的不通。

### 三 兩種實際決定兩種主義

現在進而來談談『馬克思是一個社會病理家』的問題。在我以為這個評語是很客觀、很恰當的，並沒

有攬馬克思之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尊嚴。實在，這個評語根本就是一個科學的評語，非孫中山先生不能道出，不敢道出。

要證明這個評語之恰當，首先便須明白馬克思何以沒有做「社會生理學家」之原因；而要知道他何以沒有做「社會生理學家」的原因，首先更須知道他的研究態度。他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樣式，規定社會、政治、和智識（或精神）的生活過程之一般，不是人的意識決定實際，反之，倒是社會的實際規定了人的意識」（見序言）。又說：「人類所提出的問題，從不外於它所能解決的問題，因為進一步觀察，就常常覺得要當着解決問題的物質條件存在或至少正在成長的時候，問題的本身才表現出來」。（同上）看了這些話，我們知道他的研究態度是客觀的，把思想主義看作是客觀事實之反映。孫中山先生的研究態度與他相輔不相輔呢？相同。他說：「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這不就是嗎？研究態度既相同，那末他們二位的主義就都是反映實際的了，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何以同是一種研究態度會產生出兩種相反的主義呢？這是值得分析一下的，同時，這也就是看得出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孫中山先生是「社會生理學家」之結論之所在。

現在先看決定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實際。關於這，馬克思曾有系統的說明。但在此並不引他自己的話。

爲了藉以證明孫中山先生承認馬克思社會主義之階級鬥爭論，特從三民主義中找出來。

孫中山先生說：「階級鬥爭，是當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既然如此，那末，我們要知道馬克思社會主義科學不科學，階級鬥爭論需要不需要，問題只在人類能不能生存了。如能生存，則階級鬥爭論是錯誤的，反事實的；如不能生存，那階級鬥爭論便是正確的，與事實相符的了。彼此我們再看，孫中山說：「……歐美的工業進步得很快，資本家發達到極高，資本家專制到極點，一般人民不能忍受。社會黨想爲人民解除這種專制的痛苦，去解決社會問題，無論是採用和平的辦法，或者是激烈的辦法，都被資本家反對……橫行無道。歐美……將來爲勢所迫，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思的辦法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這告訴我們甚麼？告訴我們人類不能生存。你想解決人類生存的經濟問題而去與資本家講情，無異與虎謀皮，一點也得不到結果，唯一的是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人類不能生存的經濟問題。他還說：「現在資本家有一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衝突，便發生階級鬥爭」。這又告訴我們甚麼？告訴我們馬克思之階級鬥爭學「無產專政」，都是建立在事實上的，非外於事實之泡製。這證明階級鬥爭論之爲科學的。

爭鬥問題是很清楚了。馬克思之階級鬥爭論，雖爲「病理」的，却是「根據事實」的，爲達到共產社會的

手段（或方法）之一種。說馬克思社會主義不科學的人，不僅沒有讀懂馬克思社會主義，也沒有讀懂三民主義！

決定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實際，我們知道了，現在再來看決定三民主義（實則專指民生主義。因為歐美先導國實行共產主義，毋須乎有民族、民權之革命了，中國之民生主義雖也是共產主義，但要實行它，先須要那兩個主義有了解決，否則不成功。以此，故雖是論民生主義，還是用三民主義之總名）之實際。三民主義也是主張將來共產的，但在方法上反對階級鬥爭，故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之方法是絕對相反的。孫中山先生既然也是根據事實立論，則相反的主義，必有相反的事實在了；這即是說，要反對階級鬥爭必須有不需要階級鬥爭之事實才可成立。所以，要知孫中山先生是不是「社會生理家」，只看有不有為「社會生理家」之事實就是了。如有，「生理家」在他就很恰當受之不愧了，從而他的主義也就是科學的了。

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人大家都是貧，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讀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在世界上既也不過是一個貧人，可見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之分別」。這便是說決定三民主義之實際與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完全相反，因為

中國並無『大富的特殊階級』。如說階級鬥爭是由於『人類不能生存』，則以中國與外國比，都是不能生存的（今日的抗戰，更是表現出了此說的正確性）。總而言之，中國現在無『貧富極相懸殊的兩階級』，故階級鬥爭不需要。再聽孫中山先生說：『如果我們的地主是像歐洲那種大地主，已經養成了很大的勢力，便很不容易做到。不過，中國今日沒有那種大地主，一般的小地主的權力，還不甚大，現在就來解決，還容易做到』。這便是說，中國之階級鬥爭，可以『思患預防』，歐美之所以無法防止，是因已到了『所謂積重難返』的地步，我們既有機會防止，便應該不要蹈他們的覆轍了。

你看，問題多清楚？中國現在沒有大資本家，無貧富不均的大毛病，根本不能產生與資本家對立的工人階級。所以不能用『階級鬥爭、無產專制』的辦法來在中國演唱。但也是『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指階級戰爭——絢）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止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因此孫中山先生絕不是一個機械論者，他的行爲，根本就合於辯證法的觀點，這便是他做到了『社會生理家』的原因。

不同的實際決定兩種不同的主義——兩種在目的上相同，在方法上相反的主義。此兩種主義因為都是反映實際的，故同是科學的理論，可以實踐。誰能說三民主義是科學而馬克思社會主義是不科學呢？又誰

說說馬克思社會主義科學而三民主義是不科學呢？沒有這樣的人！有之，那不過是不懂得一般與特殊的分別及其關係所造成的蠢人！

#### 四 論「社會病理」與「社會生理」

我們看了上面的分析，知道馬克思之做了「社會病理家」和孫中山先生之做了「社會生理家」，都不是偶然的。揆言之，他們都是爲歷史所造成，有必然者，話是這末說，然而却有些人認爲孫中山先生批評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家是不對的，而且表現出了孫中山先生之矛盾與保守性云。其然豈其然乎？不過，他們也沒有詳細地指出（實在，說那話的小書，我尚未見到，這是轉見於「民意」十六期的「大眾語中」的）。

• 以我來臆測一下，也許所謂「矛盾」，不過這些理由：馬克斯主張階級鬥爭，像是只見到「社會病理」；而他曾說「無階級」出發於成了新社會的「生理」方案的，怎末能以「社會病理家」來包舉他的社會主義呢？孫中山先生也是一樣，也自稱是「社會生理家」，其實他又何嘗不是「社會病理家」呢？不知道病症，怎能開出「社會生理」的三民主義呢？要說是「社會生理家」則兩個人都是「社會生理家」；要說是「社會病理家」，則兩人都是「社會病理家」。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家」而又承認可以用階級戰爭打平資

本來來解決經濟問題使社會「生理」化，這不是一個矛盾嗎？說自己是「社會生理家」而又不遺餘力地去闡明中國的病症，這不也是一個矛盾嗎？

再以我來臆測一下，也許所謂「保守」，不過是這些理由：馬克思主張階級戰爭，這是革命的行爲；三民主義主張和平，這是保守的行爲。因此，「社會生理家」表現出保守性；「社會病理家」表現出革命性。

這種臆測，我相信不會十分猜錯了的。但果真是這樣了，那他們就錯誤已極！

我們要曉得：孫中山先生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家」，是有一定的範圍的，誰不知道孫中山先生說過馬克思祇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呢？所謂「毛病」，就是專指階級鬥爭，而「社會病理家」亦是由此得名的，並沒有牽涉到改造社會上去。至於孫中山先生之是「社會生理家」呢，那也是專指「思患預防」指達到共產社會之手段而說的，並沒有牽涉到研究病理上去。分清了這點，那就不成什麼問題了。「思患預防」，可免流血、可免鬥爭，這還不是「生理」的？是的，這是「生理」地走到共產社會；階級鬥爭，要流血、要破壞，這還不是「病理」的？是的！這是「病理」地走到共產社會。更詳言之，馬克思主張「病理」地走到生理的社會，孫中山先生主張「生理」地走到生理的社會。這樣，孫中山先生又何曾否認過馬克思

社會主義之「生理」性呢？同時，他又何曾否認自己那走到共產社會之「生理」的手段不是研究「病理」之結果呢？祇要把他所指之範圍弄清楚了，那是一點也不矛盾的呀！難道孫中山先生不知道照着馬克思社會主義走是可以出現一個新的人類的即「生理」共產社會的嗎？不但知道；他自已就在用另一種方法企求一步一歩的實現呢！他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之實行」。你看，這是多麼明白！

至於說孫中山先生的「生理」方法是保守，這也有充份的理由可以辯明的。先須知道民生主義不能離開民族民權而獨立，他們有着必要的聯繫性。（胡漢民先生「三民主義之連環性」一書之所謂，大體是對的）因為有聯繫性，不可分割，故一般說來，民族革命，也就是民權革命，民生革命。所謂「生理」的方法，正是這樣看的結果。即是丟開了病床架屋的革命而看的結果。告訴盲動的人們，你們只要丟掉了病床架屋的機械的革命觀，民生主義的革命性，你就可以在民族革命中看出來的。

## 五 一支殊途同歸的勁軍

談到馬克思對於落後國走到共產社會之方法之指示，確實有欠明白。他僅僅原則地說過這些話：「（

歐洲）市民以生產工具和交通方法底迅速發展，直到把最落後的民族牽引進文明的進程之中。……他強迫他們輸入所謂文明於他們的國裏，這就是說，變成市民」。說到市民國對於落後國的影響時，有「給與那些追隨着發展階梯之後的國家，指示出自己之未來的肖像」的一個意思。是呵，這種對落後國之發展之指明是正確的。就中國說，他由封建到資本階段，不就是「所謂文明國索引」即「外譯」的結果嗎？至於所謂「未來的肖像」云者，可以說是指共產社會或大同世界。我們中國現在正在沿着這目標推進，民生主義即是向這目標推進的明證。但，他總沒有指出落後國該用甚麼方法去達到。孫中山先生看到了這層，似乎也就有些怪他不該不懂一般與特殊之分別及其必要之關係。他批評馬克思是「理學家，其話着謂：你爲甚麼只知站在資本國家研究用走到共產社會的方法而不爲我們這些落後國研究出一個「生理」地走到共產社會的方法呢？實在，孫中山先生他還疑惑馬克思是欲以一般來強姦特殊反對特殊呵。因此，他曾期期以爲不可，爲了抗拒它，並用力地闡明「生存爲進化的重心」的道理，以期樹立「生理」地走到共產社會之基本理論。這是情有可原的。同時，在落後國用「生理」的手段以走到共產社會時，此說亦頗有他的道理，未便率爾非難。（關於馬、孫兩氏的進化重心問題，我還有話說，有機會，將另文來論。）

總之，就馬克思沒有明白指示出落後國走到共產社會之方法與步驟這點而論，不能不說是一個漏洞，

不能不說是世界革命論的一個缺點。雖然以馬克思的歷史觀點、物質的辯證觀點來論，知他是不主張落在後國泡製革命的，可是，他總沒有寫落後國指出特殊的共產方法與步驟，此種缺點終於是無可諱言的。孫中山先生覺察到了這點，對馬克思表示不滿，毅然著書立說，創造三民主義開闢一條「生理」地走到共產社會之坦途，這誰能說不是他的天才的表現？說老實話，三民主義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一個補足，對於走到大同世界說來，它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一樣，是一支殊途同歸的勁軍！

## 六 提出兩個意見

三民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有什麼關係？這問題至此應該明白了，現在作個概括的說明以結束之。

馬克思社會主義是一般地走到共產社會的嚮導理論；三民主義是特殊地走到共產社會的嚮導理論。前者產自先進國，故特別適合於一般的先進國；後者產自後進國，故特別適合於一般的後進國（這是三民主義的一般性，即特殊性的一般化）。說科學的主義只該有一種不能有兩種，這是抹殺歷史之發展事實，強把歷史底不平衡弄成平衡的辦法，一點也不正確。所以我們不能以一般來反對特殊，也不能以特殊來反對一般。機械論的中國共產黨用一般來反對特殊，固是錯誤了；但有些三民主義者，以特殊來反對一般，也

不見得正確。要知用特殊去反對一般，是不懂得三民主義之證明；用一般來反對特殊，是不懂得馬克思社會主義之證明。那末，這不告訴我們：要懂得一般，就須懂得特殊，要懂得特殊就須懂得一般嗎？更具體地說：要懂得馬克思社會主義，便須懂得三民主義；要懂得三民主義便須懂得馬克思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以不懂得三民主義，故用一般來強盜特殊；有些三民主義者以不懂得馬克思社會主義，故用特殊來強盜一般。因此我的結論是：不懂得馬克思社會主義，不會真正懂得三民主義，不懂得三民主義，不會真正懂得馬克思社會主義。他們之間是有着微妙的關係，而要理解這微妙的關係，則統一一般與特殊的法則，是理解它之唯一的瓊鑰，我在此，特別籲請大家注意。

正文算是在此止步了。但寫完後我又被它導出了兩個意思，因與本文有關，特寫出以便大家研討。

第一、我覺得孫中山先生與馬克思對於階級的看法有着同樣的態度。我們知道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革命，是在階級對立到了極峯，有着決定勝負之作用之時。常態的階級對立，他只承認是存在的現象，並不主張鬥爭，因為「資產階級自從產生以來，自己就立在矛盾上面；沒有雇用勞動者，資本家就不能存在」，（見「宗教、哲學、社會主義」一二六頁）從此可見，在一個時候，地還主張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協同合作，以從事於發達產業呢？正因為這，所以他視那班領導「近代無產階級前輩」而從事於鬥爭之人為空

想的社會主義者。（我們的中國共產黨便是這一型的——）孫中山先生對於這點算是接受了，不管是有意抑或暗合了的。他說中國無階級，只有大貧小貧，因此主張和平轉變反對階級鬥爭。但大貧小貧，正是馬克思不主張鬥爭的常態的階級現象呵！然則「思患預防」，這不是建立在馬克思階級觀點上了嗎？

第二、剛才說了，孫中山先生的「大貧小貧」觀，等於馬克思之常態的階級觀，今常態的階級既不應鬥爭，則「大貧小貧」也一樣的不宜鬥爭了。孫中山先生說：「中國的頂大的資本家和外國的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資本家既都是小貧，那末說「中國人通通是貧」，却是很有道理了，而今日之抗戰，更表現出「中國人通通是貧」的共同心理來。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應該把中國作一個無階級式的被壓迫國家看，而把侵略我們的帝國作壓迫的階級看，此在世界大通的今日，落後國家之內在的「大貧小貧」的常態的階級現象，大可以壓迫國與被壓迫國之對立的鬥爭來代替它，來解釋它，我們應該在一般的落後國中喊出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鬥爭之口號，這似乎也是必然的要求，有着實際的意義。因為落後國家都是「大貧小貧」的階級存在現象，這種階級現象是常態的，失去了對立鬥爭的意義，那末，在有了三民主義作辯護理論際事實上對立鬥爭的階級之發生時，我們尤其要把它齊一化，一個階級化——被壓迫階級化。這樣做，更可加強國內團結，提高三民主義地位，增進世界革命因素，大可注意。

最後，我向政府提出一個建議，組織三民主義的國際機關，推舉蔣委員長做該國際機關的領袖，以從事向世界宣傳、組織、活動、實踐！一句話，把『大同』的兩翼開始展開來！

一九三八，五，十。

## 五 三民主義的歷史觀

誰也承認，歷史上最顯明又最主要的社會階段有三：即封建社會、資本社會、共產社會是也。

孫總理雖常說『改造中國』的方法『和歐美不同』，我們要『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它的後塵』。但這是他站在中國或後進國的場合而說的，在他分析歐美的歷史的時候，却常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詞句，並歷數資本家的罪惡。另一方面，對於歐美走到『新共產社會』的途徑，則認為須用『階級戰爭的辦法』這不很顯然地在承認歐洲的歷史進化是由封建而資本而社會嗎？

孫總理是竭力反對我們中國離開封建社會而去步歐美資本社會和共產社會的後塵的，然而，他猶不能不承認這個歷史法則在歐洲的必然性。由此可見此三個社會形態之不可抹煞了。

這三個社會形態，我們如用 總理的進化觀點來看它，更屬是有意思。不惟此，還可從中看出 總理站在歐洲的立場贊成這個歷史法則和站在中國的立場反對這個歷史法則的原因來呢？究竟 總理怎樣看歷史，他說：『三代以前，人類混混醜醜，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

期」。這。終因覺悟的歷史的知識程度所限，產生了「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錯誤思想流行於社會，深中乎人心，結果，此「欲知而後行」的時期終於變成「行而後知」的時期去了。到歐洲「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

根據 總理這個進化觀點，然後我們來看前面所舉的三個社會階段時，那末，封建社會和資本社會可說是處在第二個進化時期，即是「欲知而後行」或「行而後知」的時期。共產社會呢？則是處在第三個進化時期，即是「知而後行」的時期。

我們可以說，「行而後知」的時期，是為歷史處在「自然生長性」的發展過程中的情形；「知而後行」的時期，是為歷史處在「目的意識性」的發展過程中的情形。

不過，這個說法，在腦筋習於煩瑣的人，一定不免發出這樣的問話：你們這些喜談論社會問題的，不是常說人這歷史是有意識的行爲嗎？但「知」正是意識界的東西啊！然則怎末能說歷史進化有一個時期是處在「行而後知」的過程呢？我答道，對的！但是要知道，他們在行之前所以爲知道了的「知」及依照看它而「行」過之後一看，却是多半沒有發現。雖說在那時期人人皆「欲知而後行」，可是並沒有真的知道，因爲沒有真的知道甚麼，所以「知」總是被「行」批判的時候多，在先以爲是「知」道了的，後

來才知道是沒有知道。我覺得「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便是這種事實的具體的反映。

所謂「行而後知」的歷史或自然生長性的歷史云者，意思就是說，那時期的知不是真知，真知的成份少，假知的成份多。而知道那些知是真知和那些知是假知，則由於「行」。

舉例說吧，封建社會中人不僅不知道鬥爭的歷史將結束於「新共產社會」，而且也不知道繼它之後會有一個資本社會。資本社會中人也一樣，它不僅不會想到未來的「新共產社會」，而且簡直就把自己的社會當作「永久理性」的社會呢！

但你說它們當時就無所知嗎？不能的。封建社會中人當時不知道繼它之後會有資本社會和共產社會，此種觀念也就是以「知」的形態存在着的。而證明這個「知」的錯誤，却直至封建社會「行」過了以後。資本社會中人，常認自己的社會是「永久理性」的社會，是人類最幸福的，不知後來會有與它作生死對頭的共產社會這一觀念，同樣也是以「知」的形態存在着的。而證明這個知的錯誤，却直至資本社會「行」了過後才知道。

由此看來，知道封建社會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的，不是封建社會自身，而是繼承它去創造新社會的資本主義者；同樣，知道資本社會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的，也不是資本社會自身，而是繼

承它去創造新社會的社會主義者。

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即社會主義者知道資本社會的「知」和資本主義者知道封建社會的「知」，有迥不相同的地方，我們不可以其同爲知，就混爲一談。那末，分別何在呢？是：前者是處在「知而後行」的階段，他是以「知而後行」的「知」去知道過去，後者是處在「行而後知」的階段，他是以「行而後知」的「知」去知道過去。

而要嚴格說起來的話，資本主義者對於封建社會的認知是很模糊的，他們認封建以前的社會是一個「無意義暴力的混沌的紛亂的過程」，就是一個著例。所以資本主義不僅是對於自己的社會茫然不得真確的認識錯誤，就是對於「行」了過後的封建社會，也是未能知道一個所以然。

社會主義者那就完全不然了，他不僅把資本社會看得髮眉畢露，洞悉無遺，就是資本社會以前的社會也因此而有了一個系統的認識。社會主義者對於資本社會的知識，雖說是屬於「行而後知」的範疇，但對於共產社會說來，這却正是「知而後行」的根據，他不像創造資本社會的資本主義者，他對於自己的社會，完全是有意識地去計劃一切，處理一切。

上面說過：過去知道有一個封建階段的，是資本主義者；知道有一個資本社會的，是社會主義者；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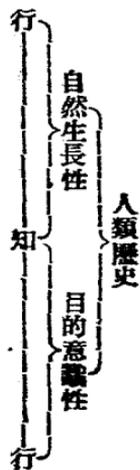
據，則知道有一個共產社會的，也應該是在「行」了共產社會以後才對，但事情並不如此，社會主義不僅標出社會主義的旗幟，而且預言羅共產社會之不會再有別的社會形態，說「人類的前史便告結束」，「不知而行」和「行而後知」的自然生長性的歷史便告終止，今後是一個「一勞永逸」的目的意識性的社會。

社會主義爲甚麼會有這種預知的能力呢？因爲它產生於「科學昌明」的今日的緣故。科學是資本社會的產物，有了它，「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期」。（總理語）社會主義正是「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因此按那主義「行之決無所難」。（同上）所以總理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根據「社會進化的情狀和社會的進化」的結果，其「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十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

一句話，社會主義的知，是一個「知而後行」的知，對於歷史發展的癥結所在，它確「真是知道了」。

是這樣一個看法，則我們對於歷史便可以說是有兩個階段，資本社會以前是行而後知的階段，是由行到知的階段，如：行——知；資本社會以後是知而後行的階段，是由知到行的階段，如：知——行，合起來便是：行——知——行。去其重複的「知」，則是：行——知——行。如說由行到知是自然生長性

的；由知到行是目的意識性的，則可寫成次圖：



由行到知和由知到行的中間，以資本社會爲界碑。正因爲資本社會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所以資本社會前期，是處在「行——知」的歷史階段的末梢；資本社會後期是處在「知——行」的歷史階段的前哨。昌明的科學是資本社會後期或近於後期纔有的，社會主義則是接受此種科學精神之成果，資本社會的制度，是它前期產物，因爲這種關係，所以資本社會後期所發展的一切科學常與產生於前期的制度相衝突，而這正是「行——知」的制度不與「知——行」的科學統一的結果，雖然前期所規定的制度爲了適應後期的科學和由此科學所產生的事實而改變了不少，然因半截是自然生長性的還是無法澈底的走到目的意識性方面來的，因此這個目的意識性還是半身不遂，共產社會恰恰是擺脫了這點。

我們用 總理這個進化觀點，對歷史作了上面的研究之後，現在我們可以轉來看中國的進化階段了。這話怎講呢？難道中國能外於那個進化法則嗎？在我們的答覆是肯定的。因爲離開封建而相繼走資本階

段、走社會階段，那是先進國家的道路，不是中國的道路，即不是中國的歷史法則，如果說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國有過一個封建階段而已，其餘的便套不上來！

前面已有這個意思：社會主義社會以後之所以不會再有過去的鬥爭現象，是因社會主義是產生於歷史發展到了由「行而後知」過渡到「知而後行」的時候的緣故。換言之，社會主義它吸收過去「行而後知」的歷史教訓，握住了今後「知而後行」的社會進化的前線！

用這個分類的方法，我們要知道中國的進化道路就絕不必在資本社會和共產社會這些名詞之上去爭辯了。而惟看：中國現在是處在行而後知的階段呢？還是處在知而後行的階段足矣。

中國現在到底是處在那一階段呢？是知而後行的階段。爲甚麼？因爲中國現在已有知而後行的三民主義。但按之此主義的創立者總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的話及他那要把民生主義實現了，社會才能達到「一勞永逸」的境地的一個意思；此外又按之蔣總裁說「革命的中心的，即在民生」，及他認爲要「民生的問題能夠徹底的圓滿解決，三民主義纔算是真正實現了」的話。則中國此知而後行的社會，便是一個民生社會了。

：這個民生社會，是緊接封建社會來的。這樣，中國自然就沒有了歐洲的資本階段和共產階段，這不是

十分顯然的事嗎？

至民生主義科學不呢？總理說：「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可見他絕對不會不按「科學之理則」去創造民生主義的。他會說：「要解決民生問題……這個方法……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不但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這亦就足夠明白了。

知而後行的主義，本來是科學昌明之世的產物，中國自身雖尚未到此境地，但總理已把歐洲的「科學之理則」吸收過來。蓋總理眼光遠大，不是鎖國主義者，不備師法本國的古今學說，也師法外國的古今學說。中國離開封建社會就能有知而後行的民生主義，這不能不說是世界大通的影響。我們一看下面這段話，當更能清楚了，這段話即：「歐美經濟之患在不均，不均則爭；中國之患在貧，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則仍不免於爭，故思患預防，宜以英美為鑒，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及關於社會經濟一切問題，同時圖適當之解決」。

這些話告訴我們：民生主義是拿中國的事實統一歐洲的資本生產和共產的目的的真知。中國沒有了分開的資本階段和共產階段。既然沒有，而民生社會也是緊接封建社會的，那中國不是由封建而民生又是

什麼呢？資本事實、共產事實；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都不過是創造民生主義的「材料」罷了，這些斷不能說明中國所處的社會階段。

文章算是做完了，現在試把中外的歷史道路作一個比較以當結束：

- 一、中國的歷史法則是由封建而民生；歐洲則是由封建而資本而社會；
- 二、中國的行而後知的自然生長性的歷史結束於封建社會，歐洲則結束於資本社會；
- 三、中國的知而後行的目的意識性的歷史開始於民生社會，歐洲則開始於共產社會；
- 四、中國的民生主義因為是產生於封建社會的積重難返的既成事實中，故不能不爲了民生社會而與封建勢力（外部的略之）鬥爭；歐洲的社會主義因為是產生於資本社會的積重難返的既成事實中，故不能不爲了共產社會而與資本勢力（帝國與帝國間的略之）鬥爭；
- 五、中國和平互助的理性社會開始於民生社會，歐洲則開始於共產社會；
- 六、中國的鬥爭歷史，終止於由封建到民生的過渡中，歐洲則終止於由資本到社會過渡中。

## 六 「知難行易」與三民主義

「孫文學說」，是帶有政治性的東西。實在，這個政治性是「孫文學說」的創造動機和產生原因。因為三民主義是一種政治主義，而「孫文學說」之提出，目的是在使國人認識三民主義的實踐性或科學性，是在證明三民主義是一個科學的實踐理論，有它的歷史根據或社會根據。

故孫先生之爲此說，意思是：三民主義已經把人類進化史中所難知道的謎知道了，這種知可以完全付諸實踐沒有空想之失。過去的「知」所以不能完全實踐者，是因爲沒有把歷史發展的謎知道，認識被其迷亂了，而「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便是此種迷亂的認識過程中之產物，是由於知之難。以其不會真的知道，故「行」起來便不免到處碰壁，荆棘叢生，而爲客觀的力量所打消了。「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便是由於這種錯覺所構成，因爲這樣，故此說不僅不能推倒「知難行易」的道理，相反，「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恰恰是「知難行易」之爲真理的極好證據。

但要使人相信「知難行易」的道理，至於「樂於行」、樂於去實踐三民主義，首先便不得不把「行易」之障礙——「行難」的思想衝破。如何去衝破這障礙呢？那就得說明這是由於對「知難」所發生的錯覺的

原因。

人是「有覺悟之希望」的，故一舉一動，必先求所知，以爲行動之嚮導，創造之明燈。但因爲真正的知，爲歷史發展階段所限，殊不容易獲得，一般人在行之前的知，因而多不是真知，照着此種非真知的「知」去「行」，當然不能一一實現。在這種「知」的面前，「行」的結果既然是如斯，而爲客觀力量所粉碎了，那末必然就會產生如下的議論：講是很容易的啊！可是行起來就難之又難了，其以知爲易，以行爲難的心理之造成，便在乎是。因此，「知難行易」，是認識「知易行難」的方法；「知易行難」是認識「知難行易」的證據。「知易行難」，是歷史事實的現象的認識；「知難行易」，是歷史事實的本質的認識。「知易行難」本末顛倒，這便是由於爲歷史現象所迷惑之故。

「孫文學說」的整個論旨，就是要證明「行難」是「知難」的結果，就是要證明「行難」是「知難」的錯覺。它要透過現象探尋本質，撥開雲霧，看見青天。

三民主義是一個理論，要實現它，就須注重「行」，把論理事實化，精神物質化。否則，理論只是理論，主義只是主義。所謂客觀的理論，實踐的理論，仍有待於「行」，它之不與那些主觀的空想的理論相同者，不是在乎不要「行」，而是照着它去「行」，不會爲客觀力量所支配所阻礙；就有阻礙，它都預知

在先，可以想法克服，而不會爲所克服。所以，「行」始終是極其重要的。

但過去的「行」之不成功，既然是由於「難知」所使然，那末要問三民主義能不能「行」，就須問三民主義是否把「難知」的知道了。倘然是把難知的知道了，證明三民主義是「真知」，則人人便自然「樂於行」，樂於去實踐了。

孫中山先生在其「自序」中說：「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之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衆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對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信仰不篤，奉行不力」。甚麼原因？「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錯誤爲何？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也。此說……數千年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劃，一一皆爲此說所打消也」。

孫先生認爲這是非常錯誤的，他說：「知非易，行非難也」。因此他要倡導「知難行易」的學說，造成「知難行易」的心理，以利於三民主義之實行和推動，以利於新中國之建設與進行。「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繫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爲用大矣哉！夫心者，萬事之本源也，濶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設建者，此心敗之也」。

假對於三民主義，怎樣使人之「心」去「信其可行」呢？惟一的方法，就是積極的闡揚「知難行易」的道理，從事實上給「知易行難」以批評。孫先生曾歷史地證明「知難行易」的道理之正確，可以說，這是一價實踐的認識論，是認識論之結晶，三民主義便是建築在這個實踐的認識之上的。

孫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它所要解答的有如下四個問題：

一、指出以知爲易，以行爲難的思想之錯誤，並指出其錯誤之根源和由來；

二、反對因「知難」而便不去「行」，贊許歷史上明知「知」是難的而勉強「行」之的「行」。雖然此種「行」因處於沒有「真知」以爲「行」之嚮導的時代，不免要受許多打擊，即許多事因而行不通，可是歷史終究是「行」的產物，故這種精神終究是可貴的；

三、說明「真知」是指把難知的「知」知道了的「知」。我們固不應輕視「真知」以前的「知」，然光是滿足此種「知」，却是很不對，必須進而求致「真知」；

四、說明真正容易的「行」，是指根據「真知」的「行」。我們雖不應輕視「真知」以前的「行」，然光是滿足於此種「行」，却是很不對，必須進而達到真正「易行」的目的。

因爲孫先生倡導「知難行易」學說的目的，不僅是要你知道「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之錯誤和要

你承認「知難行易」之正確，惟尤其是要你知道或承認三民主義是把歷史上難知的知已經知道了的「真知」，因而要你「樂於行」，守定「行」必「易」的價值去把三民主義這「真知」一一付諸實踐，化成事實、化成新中國。這才是「知難行易」的眞精神！

所以孫先生說：「……建國方略……爲國民所取法焉，然尙有躊躇審顧者，則恐今日國人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行之惟艱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以吾之計劃爲理想空談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此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爲理想空談也。夫如是，乃能萬衆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爲尤速尤易也」。

從這段話看來，可知「知難行易」的學說，其目的是在使國人承認三民主義是「真知」，可以實踐，「易行」。「知難行易」既然是實踐的認識論的結晶，因此它有方法作用，可以之作觀點用來研究歷史之發展、社會之進化，這是很珍貴的收穫。我們應該展開它、擴大它、發揚它！

實在的，「知難行易」學說之能給三民主義以堅強的理論基礎，保證三民主義之實踐性和科學性，正

是由於它的道理合乎歷史之發展、社會之進化。在這裏，「知難行易」，是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這是很顯然的。

同時，我們要攻打三民主義以外的任何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亦非把三民主義建立在歷史發展、社會進化之基礎上不可。而「知難行易」所要求的「知」和「行」，却正是這種。可是，一般社會主義者，却不懂得這些。今日國民黨的「心理」，雖已非十二年以前可比，對於「知難行易」的道理，已深加領會；對於「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雖已棄若敝屣，皆一致認三民主義是知道了歷史上的難知的主義。然在他們則殊不然，他們認為，把歷史上難知的問題完全知道了的「知」，不是三民主義也是馬克思社會主義，這是全然錯誤的。

這樣錯誤的見解，是怎樣造成的？便是由於呆着社會形態的結果。以爲歐洲的「真知」，既產生成於資本社會末期，那末，以一個尚等在由封建到資本的過渡或資本初期中的中國，那會有「真知」的主義可言呢？這種「真知」觀，我們並不根本反對，因爲這是歷史存在的事實，人類知道自己的歷史運行法則的「真知」，確實是在歐洲資本社會末期，這可以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當這種「真知」已爲歐洲變現出來了的時候，在歷史悠久、文化優厚、同化力強銳的後進國，它要奔向了「真知」的途途，不但不必轉得

資本社會末期，也不必抄襲歐洲的，它可立足於自己的社會經濟基礎，適合地創造一個「真知」的。此中國之三民主義便是此種「真知」的良好證明。

而且假如一般社會主義者，能不拘拘於社會形態（不拘拘於中國社會形態須與歐洲相同，即社會形態的價數或階段相同），而單從孫中山與馬克思兩人論究「知」之來源和「行」之發展一點而看，則兩人的見地是一致的。雖然彼此用的觀點不同，前者是用的「知難」觀點；後者是用的「經濟」觀點。但結論之殊途同歸，却是事實。同時，「知難」觀點與「經濟」觀點不但互相衝突，且可互通。講「知難」觀點的，「經濟」觀點便自然而然的寓於其中；反之講「經濟」觀點的，「知難」觀點亦自然而然的寓於其中。如不信，我們可試比論之。

孫先生說：「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爲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折而言之，第一個時期，如孟子所說的是「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的時期。因此「行」多是盲目性的、冒險性的、實驗性的，不僅行之前無所知、不能知，即行了之後亦還不知其由。第二個時期是知後便行的時期。但不是說他們在行之前就無所知或沒有知的要求，乃因其所知的不實在、不容觀，結果而爲實際

的『行』所批判，所糾正了。因此所謂『行而後知』，也即是說，實際『行』了之後才『知』，行之前的『知』是不實在的，是不客觀的。這是一個意思。再一個意思是，在此時期都認知比行難，但並不因其難知便不去行，它要『先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第三個知而後行時期，是指科學昌明之現世紀。因『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也』。不過，這可就兩方面言，一是自然科學，一是社會科學，因自然科學至現世紀才『昌明』，欲明瞭自然界的道理，已『有具』可求得其『知』了。而社會科學呢？亦因社會關係發達，日趨於『昌明』，馬克思社會主義其例也。因馬克思社會主義，便是『行』（創造共產社會）之前的知。中國現尚處於幼稚的資本初期，要達到『有具』以求自然界的『知』的目的，或對於社會之創造要達到先知而後行的目的，均可『取資』『其外』（指外國），我們不應『孤立自大』。中國『從來若欲有所改革，其採法惟有本國，其取資亦盡於本國而已，其外則無可取材借助之處也』，這是完全不對的，『而不知有社會互助之便利，人類交通之廣益也』。因此孫先生要我們『知國際互助之益』去『取人之長，以補我之短』，認『中國所不知所不能知者，購以爲毫無由強致之』的，是『鎖國』的思想，應該『打破』。因『今日立國於世界之上，猶於人處於社會之中，相資爲用，互助以成者也』（均係孫先生語）。

這就是說：「知而後行」的時期，不僅是在歐洲已經到來，即中國亦可因「國際」「互助」關係，而進入於這個時期了。三民主義便是中國進到這個「知而後行」的時期的明證。即歐洲的自然科學所產生的一切成果，亦均將在此主義原則之下而「取資」之、發達之，拋棄科學文明的「惡果」，保存科學文明的「善果」，以造成科學的新中國！孫先生之說中國現在是「以有爲之人，據有爲之地，而遇有爲之時」，「適爲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者，就是以此。

總之，三民主義是中國「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的主義。它之能達此目的，就是因爲它把歷史上難知的問題完全知道了。故「孫文學說」從知識（或思維）發展史的分析上堅強了三民主義的科學性，是一個實踐的認識論，很是客觀，非常物質。因此，「孫文學說」是實踐論的，是物質論的。換言之，這是實踐論的「知難行易」學說，這是物質論的「知難行易」學說。倘有人把此「知難」學說，認爲是唯心的，與實踐論、物質論不相容，那就荒謬之極了。

而且因爲這種關係，故馬克思的歷史觀點與孫先生的「知難行易」有相通之處。不過前者是着眼於經濟的發展，後者是着眼於知識或認識之發展罷了。結論則一致，毫無衝突。這是很有趣味的一椿事！

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樣式（或方式）規定社會政治和智識（或精神）的生活過程之一般，不

是人的意識決定實際，反之倒是社會的實際決定他們的意識』，我們對於一個『變動時代，不能照它自己的意識去判斷，正由對於人不能照他對於他所有之觀念去判斷一樣。反之，倒須得用物質生活底矛盾，用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說明這個意識』。

爲甚麼對於智識（意識或精神）須用生產與生產關係去判斷呢？這就因爲那些智識多非『真知特識』（孫），與生產力之發展要求多不十分相應。就是說，那些智識對生產力的必然性沒有正確的認識；因爲沒有正確的認識，故結果不免寫生產力所造成之客觀力量所支配，不能一一實現。而這不正是由於『知難』的結果嗎？

再聽恩格斯說吧。他說：『人類的歷史，是有意識的創造，所以有一定的目標，放在歷史前程。但是我們把人類的歷史，即使現在民族的歷史，仔細研究起來，我們仍然看得出，他們所預定的目標，與其所得的效果，又不免有參差的情形。同時，受人類支配的力量，又較大於人類有計劃的活動的力量』。

爲甚麼人類活動『所預定的目標，與其所得的效果，又不免有參差的情形』呢？這不正是由於那些『有意識』的『預定目標』之非『真知特識』嗎？因此，這些都可以用『知難』學說去說明的。

這樣比較研究起來，『知難行易』與馬克思的歷史觀點不是可以互通的嗎？雖然如此。

還有一點可以互通的，這便是孫中山、馬克思兩人對於發現『真知特識』的所在時代的一點。對於孫先生的，上面已經說過了。他認爲人類進化到『知而後行』的時期，必須是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文明世界，已往都不可能。而所謂『文明世界』，即是指的今日的資本社會。因此孫先生以爲要人類的活動不受歷史的支配，人類的『知』不爲『行』所批判，能走到真正的『知而後行』的時期，不會『錯誤』『費時失事』而收『事半功倍之效』，這是資本社會之功。要在此資本社會中才能充分地供給你的認識的材料，使你有機會創造，可以成爲『有意識』的行爲。

此就馬克思的歷史觀點看，亦是如此。我們看惠格羅斯說：『在工業發達的國家』，『社會關係發達，就不難有意識的組織。此時，新的歷史時代開幕了，人類的活動與自然科學所得到的勝利，在先還認爲是一種隱隱約約的影子的，將來就會有把握了』。

所謂『工業發達的國家』，就是孫先生所說的現代文明世界。這不看出他們對於歷史的『真知特識』之發現時代，是具有一致的認識嗎？

還不止此呢？他們仍爲都認將來的世界是一個『知而後行』（孫）即『有意識地創造』（恩）的世界，是一個行動起來不會『錯誤』『費時失事』（孫）即『不受』『客觀的歷史動力』所『支配』（恩）的

世界，故一政反對達爾文把「物競天擇」的原則施之於將來社會。

先看孫先生說吧，他說：「至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而學者多以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競爭生存乃屬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爲人類已過之階級（即階段——海），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

次看恩格斯說吧。他說：「達爾文謂自由競爭、生存鬥爭是生物界之經常的狀態；他卻不會知道有種經濟學家所謂歷史的成績，是不能應用之於人類的社會的，只有社會生產之有意義的組織，才能使人超越動物的境界。因爲有意義的組織中，一切生產與交換都成爲有計劃的活動了」。

這虛個是不謀而合，東西並美矣！

三民主義，馬克思社會主義，便是根據這種認識、這種邏輯而創造出的「有意義」的自覺的主義。前者是中國走上「大同世界」的嚮導；後者是歐洲走上「大同世界」的嚮導！

但就絕對「互通」了嗎？也沒有的。所謂「互通」是指認識相互通、邏輯相互通，即結論相互通。而反映這種認識、邏輯和結論的事實，却並完全相互通。國際地看來，事實可以說是互通的；但個別地看來，却各有特殊事實在，有不能互通的地方。這不能互通，就是這兩個主義並存於世，各顧東西的理由。

，誰也不能干涉誰，誰也不能統一誰。

此不能互通的地方在那裏呢？即是：資本社會對於馬克思社會主義的關係是直接的，有產生的作用；對於三民主義的關係是間接的，僅有借鑑的作用。再則就是：共產社會的經濟基礎建立於資本經濟上，三民主義（或曰民生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建立於封建經濟（或資本幼稚期的經濟）上。這便是認識相同、邏輯相同、結論相同而事實不相同之所在。

總之，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是「知難行易」，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物質史觀；知難行易可以包括物質史觀的道理，反之，物質史觀亦可以包括知難行易的道理。它們同是實踐的認識論，可以說明歷史之發展，社會之進化。而特殊的說來，則它們各有其說明歷史發展、社會進化之場合！尤其是具體地說明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各自的產生背景時，觀點不可混同，不可混用，即對前者必須用知難行易的觀點，對後者必須用物質史觀的觀點。

一九三九，二七於北碚夏溪口。

## 七 與陳伯達論三民主義底研究原則

怎樣去研究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研究原則應該是那些？這問題是很有探討之必要的。

因爲三民主義研究原則之提出與確定，於認識三民主義說來，其關係非常密切而重大。以此，倘有人對三民主義與以歪曲和割裂，提出些不恰不類的研究原則來，那就很有害於三民主義的正確認識，是宣傳上的一個大障礙，對此實不能不注意。而陳伯達先生在「三民主義概論」一書中，恰正是在歪曲三民主義，提出反三民主義的研究原則，對三民主義作種種不正確的解釋。因特草此文與以批評。

我們知道，陳伯達先生今日已是共產黨席上的「上賓」了，由於他曾「用最大的興趣」去響應共產黨的兩次革命論，去鼓吹兩次革命論，把三民主義作爲兩次革命論當中的一個革命階段中的主義的緣故，故現在已經位列所謂「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了。這可說是他「最大的興趣」的成功！

過去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時代，滿以爲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可以在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的時候，用煽動和奪取的方法去達到它的。乃盲動了十年，一無所獲！現在既覺此路不通，於是便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離得開些，推得遠些。抗戰後的共產黨與抗戰前的共產黨之不同點，僅此而已，其爲「兩次革

命論』的追逐者，則仍無不同。

陳伯達從共產黨這種轉變上來透視三民主義，來『擁護』三民主義，使達到『擁護』三民主義不妨礙到『擁護』共產主義的目的，那末對於三民主義他不能不有一套巧妙的解釋。

這種解釋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即：承認三民主義的資本主義性，承認三民主義在現階段的實踐性與建設性，而願爲三民主義的實現奮鬥。這是一個態度。再一個態度是：將三民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說成爲空想，說成爲『烏托邦』，說成爲『主觀上的』『憧憬』，從而否 三民主義實現『大同世界』的可能性，把這種可能性完全送給共產主義去包辦。他一方面則把三民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當成胭脂水粉，盡量的抹在共產主義的臉上，弄得花枝招展地到處逢迎賣笑，到處招搖撞騙！

陳伯達提出的三民主義研究原則，就是根據這種態度出發的。他所提出的有三個，並認爲以這個研究原則去解釋三民主義，才是『科學的解釋』，因在他自己看來他所提出的原則，是『真正根據科學的原則』。『哪！這可了不得！』

那末，我們就試來分析這三個研究三民主義的『科學的原則』吧。

第一個研究原則，陳伯達說是要不『把三民主義當作舊思想或舊教條』看，因它『是近代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中國的歷史產物，是近代中國民族的矛盾和社會的矛盾的一種反映」。但，這話也還不夠說明三民主義的「反映」過程。因為中國之會變成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雖有自己的內在矛盾，但主要的却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使之然。以其如此，故在「近代中國民族的矛盾和社會的矛盾」中，滲透有資本主義世界矛盾和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在。要是把「中國民族的矛盾和社會的矛盾」孤立地去看，那就會失之錯誤。因為三民主義的「反映」背景，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三民主義的唯一實行領袖——總裁，深明此中道理，所以說道：「總理的遺教，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的國情以攝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之精華，再加以自己所獨見創造的許多真理所鑄鑄之整個的完美的思想體系」。

三民主義既是這樣的一個綜合的思想體系，所以它不但不不是中國的「舊思想或舊教條」，而且也不是歐洲資本階段的「舊思想或舊教條」。陳伯達以為三民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嚮導理論，中國獨走歐洲的道路，這就把它看成歐洲的「舊思想或舊教條」去了。這是沒有理解「中國民族」的說法！

是的，「在過去中國是沒有，也還不能有整個三民主義的思想」的。但，苟如陳伯達所說，三民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理論的話，又難道在歐洲資本階段有過此「整個三民主義的思想」嗎？沒有的！孫中山先生

的話就是證明。這話是：『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消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害，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小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播揚時代也』。

這樣可見，在歐洲資本社會，沒有『整個三民主義的思想』。那末，照這個思想去建設國家，又怎末會是資本社會呢？又怎末會是歐洲資本社會的『舊思想或舊教條』之中國版呢？

所以認爲三民主義不是中國的舊思想或舊教條，這我們承認。但尤應進一步認識：三民主義也不是歐洲任何社會階段的『舊思想或舊教條』才對呢？

第二個研究原則是『實踐第一』。陳伯達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如果離開了真正的救國的實踐，離開了三民主義此時此地的實踐』，那是『會掩蓋三民主義的革命生命』的。這話自然不能說全不對。但如有人把三民主義的實踐任務局限於現在，硬把它束縛在所謂資本階段之內，不許它或抹煞它站在『此時此地』的實踐場合去爲遠大的理想任務——共產社會而打算，這也是錯誤的。

我們應知道，爲遠大的理想社會而奮鬥；這不是錯誤；其所以錯誤者，乃在於把此理想『脫離此時此

地的實踐」，超三民主義地去幻想共產主義的世界。像陳伯達們便是如此的想頭。因此，如在三民主義之內去「企求」理想社會之實現，倒並不「令人難以索解」。實在，爲了「免於第二次之革命」（「階級鬥爭，無產專制」的社會革命）不「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而在「此時此地的」救國實踐上就注重到這問題，却是千萬應該的。同時，所謂「實踐」，是三民主義的實踐，三民主義中每個主義的實現，容或有先後，但不能說彼此是獨立的而無聯繫。救國的三民主義既以「共產」爲「大目的」，則在「此時此地」開始「實踐」之時，我們用些「興趣」去談它，端正其步驟，那是非常必然的。惟有把三民主義看成是資本主義理論的人，才會說這是不應該。但這是「企圖」用共產主義的「興趣」去冷淡三民主義的社會理想任務的勾當，殊不正確！

第三個研究原則陳伯達說是要有「反獨斷（反教條）的精神」。理由呢？是：「三民主義隨着民族的和社會的矛盾的發展，隨着中國革命實踐發展，自己也是發展的」，所以我們「要繼承中山先生過去表現過的反獨斷（反教條）的精神」。是的，但你看怎樣去理解孫先生此種「反獨斷（反教條）的精神」。如是說三民主義發展得不夠，不應「獨斷」，必須信仰共產主義，繼續在中國來實現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專政，這才是繼承了孫先生「反獨斷（反教條）的精神」，那就「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固然，三民主義有其發展的歷史。但，這是綜合的發展歷史，而不是分立的發展歷史。這即是說，三民主義不是由一民主義而二民主義而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三大旨』一語，雖始見於「中國同盟會本黨宣言」，然在「香港興中會宣言」中，即已有此意思。因此三民主義的分立發展史，不存在於中國，而存在於歐美。換言之，三民主義中的每個主義，在歐美是一個一個產生的，而不是同時出現的，各有它的空間性和時間性。孫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就已道出了這點，此看我前面第一個研究原則中所引的話便知。因為這樣，所以孫先生說：『我們抱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和各國的革命黨，都是大不相同的。各國的革命黨，不是祇抱一個主義，最多就是抱兩個主義，向來沒有抱三個主義去革命的。世界中明明白白抱三個主義來革命的，祇有我們中國國民黨是頭一個』。

明白了這點，就知我們現在用三民主義去反對任何主義（連共產主義在內，但只反對它的方法），並非『獨斷』，因而『反獨斷』一語，不能用來反三民主義或作為反三民主義的理由。陳伯達的意思是：共產主義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我們如果專只信仰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便為用『獨斷』的精神反對進步的證明。

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共產主義原就是三民主義構成因素之一。孫先生所謂民生主義，在一般的意義

上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因此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已爲三民主義所發展了。陳伯達以爲三民主義還未發展到社會主義，這是對三民主義的『發展歷史』無知！用的是『分裂』的觀點。

三民主義既然統一了社會主義，要實現『甚麼事都可以共』的『新共產社會』，於目的上與共產主義相同，則反對共產主義，又怎能說是在『獨斷』呢？又怎能說是在反對『發展』呢？沒有的啊！告訴陳伯達吧！三民主義所反對的共產主義，是與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相『分裂』的獨立的共產主義；三民主義所不反對的共產主義，是與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相『統一』的綜合的共產主義。

所以，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分裂』的獨立的共產主義施之於中國，完全不是『獨斷』，不是反『發展』。它之不是『獨斷』，不是反『發展』，正如『分裂』的獨立的共產主義的方法（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無產專制），在某些先進國之不是『獨斷』，不是反『發展』是一樣的。三民主義有那些非『獨斷』、非反『發展』的大原則呢？有這些：如民族主義主張由民族主義走向世界主義（大同世界）；如民權主義主張經過訓政還政於民；如民生主義主張和平轉變走到共產社會都是。

如此則三民主義反對適用於歐洲而不適用於中國的共產主義，不但不是『獨斷』，而且就是『反獨斷（反教條）的辯證法之精神』！反對三民主義綜合共產主義，而主張跟着歐洲一階段一階段地來幹，這才

是『教條』的『獨斷』精神。其距辯證法實不啻十萬八千里！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事情是很明白的：陳伯達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原則，根本就是反三民主義的，用的是兩次革命論的觀點，與三民主義的創立者孫先生之欲『免於第二次之革命』的一次革命論是相衝突的。因此，那三個研究原則，毫無『科學性』之可言！如說是科學的，那也指先進國而言。中國不同於先進國，自有其發展道路，故如把歐洲需要的東西，完全移植到中國來的話，那正是反科學、反辯證法的，毫無足取！

所以我們不能用這種反科學、反辯證法的研究原則去研究三民主義。要不然，那就會走到反三民主義的路上的，此不能不當心！

陳伯達爲甚麼會提出此種反三民主義的研究原則呢？此在思想領域來看，那就是由於不懂邏輯，死看辯證法，呆看辯證法，把辯證法完全送給『封建——資本——社會』這個公式『獨斷』了的結果！現在復就這點來論究一下吧。

恩格斯說：『必然還沒有被意識到的時候，必然是盲目的；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我們根據這個真理來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是這樣的：在沒有爲馬克思認識出資本社會經濟產

生出社會主義的「必然」時，社會主義的「必然」是「盲目」的；及到「被意識到」它的「必然」的時候，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才是「自由」的。這「自由」即是「必然的認識」。換言之，這是認識了「盲目的必然」的「自由」。

現在我們再根據此理來看三民主義或三民主義的國家社會吧。那末，三民主義便是在中國資本初期「意識到」了歐洲由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的「必然」與實踐的「自由」而後創立的「自由」的三民主義。所以這個三民主義來自對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盲目的必然」與社會主義社會的「自由」的「必然」的綜合「認識」。

歐洲由資本到社會，是由「必然」的「盲目」階段進到「必然」的「自由」階段。中國則整個是「必然」的「自由」階段。如果說也是由「必然」的「盲目」階段進到「必然」的「自由」階段的話，那亦不是由資本到社會，而是由封建到民生（民生主義社會）或社會（因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因為這種關係，故中國發達資本，不會產生「必然」的「盲目」現象，像發富懸殊、階級對立的資本惡果就不會有了。這是認識了歐洲的歷史的「必然」的「盲目」與「自由」之後，而在中國的客觀基礎上「擴而充之」的結果。

陳伯達不然，他反對中國這種必然的自由。當人家在由封建到資本的過渡階段中，即已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流弊的發展與構成的必然因果關係的時候，它也反對利用這『必然的認識』去『自由』地防止資本主義的流弊，且還說這種防止方法是空想的，是主觀的。因此，陳伯達抹煞三民主義根據『必然的認識』所創造的『自由』處理資本流弊和進到共產社會的方法。這是百分之百的愚蠢的經驗論者！

如此，陳伯達就根本沒有認識三民主義。沒有認識三民主義就來大談三民主義的『研究原則』，並且說是『科學的研究原則』，亦未免過於喜歡弄筆墨了！

實則要認識三民主義的創造過程和創造它的方法是並不十分難的。而『實業計劃』結論中所說的一個比喻，恰正是認識三民主義的創造方法的至可寶貴的一段。這段話怎未說呢？如下：

『發展中國工業不無如何，必須進行。但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乎？然此之舊路徑，不管如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海程。考其時之海程，由歐洲起向西南方，經加拿利 Canaries 島至巴哈馬羣島之聖沙路華打，遠程極遠，與現行之航線取一直捷方法，路程短於前時數倍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西方文明之路徑，是一未闢之路徑，即不管如哥倫布初往美國之海程，猶人行黑夜之景況。中國如一後至之人，可依西方已闢之路徑而行之。此所以吾等從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預知其彼岸為美洲新大陸，而非印

度矣。經濟界之趨勢，亦如是也。

把這段話來理解，則「自由」好比是由歐洲往美國「從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預知其彼岸為美洲新大陸而非印度」一樣。「盲目」便好比是「由歐洲起向西南方經加拿利 Canary 島至巴哈馬羣島之聖沙路華打」始能達到「美洲新大陸」一樣。而抹煞「自由」，便好比是不許往「美洲新大陸」的人「從大西洋西向而行」，一定要他們走「哥倫布初往美國之海程」一樣。其不應該如此，那是三尺之童都能了然的事。

光明未發現前，去走黑暗「盲目」的道路，情尤可原，因為光明的道路，根本就待於新開，無「已開之路徑」可行故也。但光明既已發現，也還是去走「未開之路徑」，「行黑夜」，那就是蠢徒！

歐洲社會的光明自由的道路，發現於資本社會末期；中國則因為「是一後至之人」，吸取了先進的經驗和教訓的緣故，它的光明自由的道路，開始於由封建到資本的過渡期中；若以先進國的社會進化階段而論，其自由則提前了一個社會階段。正因為提前了一個社會階段，所以比歐洲就少了一個社會階段，它把歐洲的社會階段併作一個三民主義或民生主義的（簡稱民生階段）社會階段去了。此個社會階段，是一個大社會階段，好比三民主義是一個「大主義」一樣。不，此大社會階段就是實現此「大主義」的結果。

可是陳伯達不管這些，他要將這提前了的光明自由之門關閉着、掩塞着、自覺地去製造黑暗世界，而

讓人們摸索前進，任其碰得焦頭爛額，鬧成一場糊塗的境地！一定要中國摸索走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末期，才肯將自由之門打開？這不是笑話嗎。而陳伯達却正是製造這些笑話、羅織這些笑話！太可悲了！

所以，陳伯達是科學的叛徒，是辯證法的敵人！他對於科學和辯證法，是用對付犯人的手段，將其囚籠起來，限制它的應用範圍和發展前途！他提出的三民主義研究原則，就是施用此種手段的極好證明？

一九三九，六，二十三於重慶南岸。

## 八 與陳伯達先生論三民主義

### 一 引言

我讀過陳伯達先生的「三民主義概論」一書之後，曾寫了一篇與他論三民主義的研究原則的文章。在那篇文章裏，我指出了他提出的三個研究原則是反三民主義的，是企圖用「階級鬥爭、無產專制」(總理)的共產主義來「獨斷」三民主義、割裂三民主義，為共產主義壯聲勢，找出路、覓地盤，現在則進到三民主義的本題上來與他討論。

世界各國歷史的演變，不是整齊一律的，而有其不平衡性存在。根據這個不平衡性，歷史的道路——趨向「新共產社會」的道路有兩條。一是階級鬥爭的，一是和平轉變的。前者用為嚮導理論的，是單純的共產主義；後者用為嚮導理論的，則是綜合的三民主義。

道理很顯然，因為共產主義是資本社會末期的產物；三民主義則是由封建到資本階段的產物。以其如此，故共產主義必須用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方法去達到無產專政的共產社會。反之，三民主義就必須用

國營實業、節制資本等方法去達到和平轉入『新共產社會』。

但陳伯達並不這樣看，他要用前一條道路去破壞後一條道路。其解釋三民主義就是用分裂的觀點去拆散三民主義的綜合性。

陳伯達知道民族主義原是主張與世界主義即國際主義相結合的；但他却又說非此民族主義所能勝任，要分裂它們。他也知道民權主義是主張『廢除以資產階級為標準的代議制』，實現全民政治的；但他却又說非此民權主義所能勝任，要分裂它們。他尤知道民生主義是主張『打倒資本家』，反對『少數富人專利』，要實行『協作共享』的『新共產社會』的；但他却又說非此民生主義所能勝任，要分裂它們。

大家想一想，這些原屬於三民主義的而又說非三民主義所能勝任，這豈說得通嗎？並且，這些都是三民主義的基本骨幹和基本內容，把這些抽出了，則所謂三民主義和三民主義國家，那就算是不堪想像了！如此的三民主義維護者，真令人莫測高深！

三民主義的只能是三民主義的，分裂它、曲解它、利用它，都是爲三民主義所不容許的。我們必得用三民主義的綜合觀點，去批判那些企圖分裂三民主義的曲說！

現在就進而看陳伯達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吧。

## 二 關於民族主義

總裁曾告訴我們：『三民主義是救國救世界的主義』。但要救世界必須先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民族主義便是這樣提出的。遠在道光緒卅一年，孫先生便是這樣解說民族主義。陳伯達定要說是受了蘇聯『革命的民族主義』的影響，那是對三民主義的發展歷史無知！孫先生在『民報』紀元節演詞中所說的話便是證明。他說：『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他當初滅漢的時候，攻城破了，還要大殺十日，纔肯封刀，這不是人類所爲，我們決不如此。惟有他阻害我們，那就盡力懲治，不能與他並立』。請問，這不是『革命的民族主義』是什麼？

因爲孫先生對民族主義具有正確的認識，所以當他看到歐美帝國主義有些也是民族主義的產物而時候，他便想法避免那種惡果。民生主義便是爲達到這個目的而被提出來的。實在，也只有這樣，才能在事實上表現民族主義的革命性，也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

因此我們認爲民族主義必須是能夠避免資本主義惡果的民族主義，否則就很難看出它的進步性。

就講今日侵略我中國的日本吧，確如列寧所說的，「歐洲人在亞洲各國作殖民地的搶掠，結果，在其中國鍛鍊出一個日本，使它獲得最偉大的軍事勝利，而這些軍事勝利却保證了日本有獨立的民族的發展」。可是，這個民族主義的國家，於今只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它自己已開始壓迫其他的民族，東縛殖民地」了。

但，陳伯達所稱許的中國民族運動的內容，也就是列寧所說的，以其可以「恰巧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最好的條件」的緣故。復觀陳伯達此語：「這種民族國家的建立，又可以造成爲將來歷史奮鬥的便利的條件。」那末就很清楚，在陳伯達看來，中國民族發展資本之結果，必然產生階級鬥爭，釀成貧富懸殊的現象，繼之即來到一個「便利的」無產階級革命。

所以陳伯達口中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意義，只是因它是資本主義發達的護衛者，無產階級革命的「便利的」前提條件而已，此外沒有別的。

是的，中國決然可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魔掌中「鍛鍊出一個」「保障」中國民族「有獨立……發展」的環境。可是，這個「發展」的內容，既是資本主義的，爲「資產階級的國家」，與日本過去的「發展」途徑沒有二致，那末又誰能「保證」它不去「壓迫其他的民族，東縛殖民地」呢？這不正是資本主義

民族發展的必然嗎？因此，陳伯達所說的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比歐洲的沒有什麼進步性可言。那只是再版，而不是新版！

若說以中國的民族運動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所以有其進步性。但打倒了帝國主義，自己又向帝國主義的路上走，還不是以暴易暴嗎？若說因為中國爭取民族發展的時候，是處在世界社會革命高漲（？）期，它可能在此民族獨立的前後爲『中國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直捷走上社會主義之路，所以它是進步的。但今日號稱領導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那樣的脆弱，並且它也只有爲三民主義奮鬥，才能在形式上存在着。

總之，無論從中國的民族運動是打倒帝國主義一點看，或從此運動是處在社會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一點看，都不能證明民族主義的革命性之發揚。惟有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相結合，才能保證民族主義的革命性，可以看出它是中國目前的民族主義的新版，而非歐洲民族主義的再版；不但此，同時也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再版呢？三民主義的民族國家的意義是：反對外部的帝國主義，自己不走資本主義的舊路，使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即中國的社會主義）相結合，造成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從『國民的國家』到『社會的國家』之間，再沒有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介乎其間，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

中國走向國際主義的直接的橋梁。要這樣的民族獨立的國家，才是真正進步的民族國家，才是真正革命的民族國家。

陳伯達主張中國民族走資本主義的路，結果不過是歐洲民族主義的再版。若以爲繼此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之後還須有一個無產階級的民族國家，這也不過是蘇維埃民族主義的再版。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個「一勞永逸」的民族主義，就國內言它以民族福利（相對的）始，以民族福利（絕對的）終。就世界言，它以民族福利始，以世界福利終。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是以民族福利（相對的）始，以階級福利（資產的）終；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是以階級福利（無產者的）始，以民族福利（消滅階級）和世界福利終。這很顯然看出：中國由民族福利到民族福利之間，沒有了階級福利存在。因爲這樣，所以這個民族國家既是發達國家資本的民族國家，也是實現共產社會走上世界主義的民族國家！把這個民族國家與實現共產社會走上大同社會的民族國家分開，看成是對立的東西；而把前一個民族國家送給資本主義，把後一個民族國家送給共產主義，這都是在歪曲三民主義的民族國家，分裂三民主義的民族國家！

### 三 關於民權主義

談到民權主義，它有一個最大特色，就是始終主張國家的自由而不主張個人的自由。以國家自由為起點，以世界自由為終點。因此，民權主義是要個人服從國家，通過國家的自由去實現每個國民的幸福的自由。所謂『還政于民』。民只是要人民直接保障或管理國家的『自由』而已。國民則在這自由獨立的國家中去實現『國民的國家』，去培育『社會的國家』，以達到這個幸福的國家化！所以，這裏一貫地容不得個人自由，即容不得個人主義。

假如個人自由，則團結因以渙散，不能結成『石頭』般的團體。如此，則無法實現孫先生所說的『民族的國家』。假如個人自由，則軍閥官僚、豪紳買辦均藉口自由而叛變民國；各黨各派則藉口自由而宣傳各自信仰的主義，造成特殊的勢力和派系的利益。如此則無法實現孫先生所說的『國民的國家』。假如個人自由，則在經濟上流為放任主義，自由競爭所至，階級因以形成，貧富因以懸殊。如此，則無法實現孫先生所說的『社會的國家』。

這樣看來，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所排斥的自由，是指那有妨礙民族團結的自由，是指那有妨礙主義信仰一致的自由，和有妨礙國民經濟生活協作共享的自由。

民權主義它要防止這些自由為害於民國，所以主張訓政，通過憲政統來還政於民。訓政的意義，就是

要把歷史上自然生長性的『自由』，用高壓的目的意識性的方法去克服它、排除它。這些克服了、排除了，然後就將那以國民利益爲目的的民權交還給國民。所以，這種民權，是國民的民權而非階級的民權或自私自利的民權。

倘有人用階級的觀點來要求實現無產階級的民權國家的『自由』，要求宣傳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的『自由』，則這些『自由』當然是爲民權主義所不許可的，並且這正是民權主義之所以爲民權主義的所在。陳伯達不懂得這些，這還是『限制人民的自由，這是不合民權主義的』，那是他根本不懂民權主義爲何物的歪曲論調！

陳伯達很憤慨地說：『……三民主義……也是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爭什麼自由呢？爭民族的自由，爭民權的自由』，爭民生的自由，把『三民主義和爭自由分開出來，這是不妥當的，這是對三民主義完全有害的』。可是他不知道：三民主義所要爭的『自由』，是『國民』的民族自由，是『國民』的民權自由，是『國民』的民生自由。你們要利用這種『自由』去爭取無產階級的民族自由、民權自由和民生自由，却是和『國民』的民族、民權和民生的要求相衝突的啊！

很明白的，你們是想要『自由』地『去擴大選舉的運動，去擴大被選的活動，以便提高自己（無產階

級；夠「政治上的地位和力量」而「繼續爲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到底」啊！

上面已經道過，民權主義是全民政治，只要你反對民國，違反全民政治的原則，你就可以有權管理政府和國家的。因此，民權主義並不「恐怕普通工人，農民當選……管理國家」的。假如國民政府在過去乃至現在對於「工人、農民」不輕易讓他們去管理國家，那是因爲自稱領導中國工人、農民的黨派要利用他們，煽惑他們去爭取階級的民權的緣故。階級的民權，正是反全民政治的。換言之即是反民權主義的。

從這點看來，訓政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在這訓政時期中，人民不能普遍管理國家，這不是陳伯達所說的是在「縮小人民選舉權力和作用」，相反而是在訓練「人民選舉權力和作用」。在防止某些黨派利用「人民選舉」來「用『權力』」陳伯達非常誇張所謂「十年中的中國工農革命運動」，他說在這個運動中，「證明了普通工人和農民都能夠表現了很大的才能，並且能最敏捷、最廉潔而管理自己的國家」。

他們所「管理」的「國家」在那裏？過去的所謂「蘇區」？今日的所謂「邊區」嗎？這倒可以不去深究。但有一點却不能不說出來，這即是中國工農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所「表現……的才能」問題。因爲當時工農所「表現」的「才能」主要的便是打倒所謂資產階級，屠殺工農以外的國民，欲變成階級的民族、階級的政治和階級的社會。民權主義既然是主張全民政治，這不正「證明」中國不需要這種「很大的才能」

嗎？這不正『證明』今日限制某些人的『自由』是訓政過程中所必需嗎？一句話。此『證明』民權主義之正確！

談到民權的機構問題上時，陳伯達以爲『真正直接民權』，『在乎人民代表機關立法權與政權的結合或分離』。『資本主義國度代議制之民權的不真實，首先是在於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裂，真正的直接民權，首先就是要把二者統一起來』。怎樣『統一起來』呢？即依他『合併於人民所選舉的代表身上』。其實，直接民權的意義，並不在這種抽象的『統一』或『結合』，而在於行政和立法是否均由人民直接所選舉出來，選舉出來了之後，人民又是否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這才是『真正的直接民權』。

民權主義主張『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同時國民大會職權，又可以修改憲法，制裁公僕。於此可見，只要人民有了選舉、創制、複決、罷免四直接民權，則行政與立法就必然『結合』或『統一』在人民代表身上了，這是毫不成什麼問題的。

奇怪的是，陳伯達把行政權和立法權之結合，叫做『真正的直接民權』。其實，『真正的直接民權』，是民權主義所講的四個『政權』，即『人民權』，行政與立法結合在人民代表身上，這只是發揮此『人民權』的結果，它本身不能叫做直接民權。這個道理很明白的，但陳伯達却鬧不清場，不說選舉、創制、

複決、罷免四權是直接民權，却要離開創制、複決、罷免、而抽象地說『人民代表機關統一立法權與行政權』，才是『真正的直接民權』！這簡直是缺乏常識，沒有頭腦！

此外還有一點，那就是他不理解『治權』或『政府權』中的監察權。陳伯達說：我們『可是不能把這個監察權脫離人民，而高立於人民之上，孤立於人民代表機關之外，以限制人民選舉的權力作用』。這話，完全是向空射擊，無的放矢！

監察院院長雖是『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者，『但不對總統及立法院負責』，而『對國民大會負責』。『監察院人失職』，『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如此，怎能說監察權是『脫離』了『人民』，而『孤立於人民代表機關之外』呢？

陳伯達還主張要人民去『實習』民權。不知國民黨的訓政工作，就是『實習』的一種形態。當然這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實習』。中國能不能任其自由去『實習』民權呢？不能。因為如任其自由『實習』，則歷史上種種自然生長性的『自由』，必然紛然並陳。你照共產主義去『實習』，他照國家社會主義去『實習』……這樣，實習的結果，定然是一場混戰！

陳伯達又說道：『如果各個散沙是彼此被隔絕起來，彼此不得互相接近，散沙又何能結成石頭？可見

散沙的能結成石頭，也需要一種可以結成的自由機會」。因此他結論道：團結須「自覺的結成」，由「自覺」去「發展這團結」、鞏固這團結，這種「自覺就是真正的自由」。

不錯，團結應根據「自覺」。但你們又爲甚麼不自覺共產主義之非呢？要知這種不自覺，就是現在的「團結」不「鞏固」，無由「發展」的癥結所在。對於，「自覺就是真正的自由」，但現在又有誰不准你們趕快去「自由」地「自覺」！

在要結束民權主義之討論前，我還要指出、民權主義不僅是「反帝、反封建的」，同時，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陳伯達說孫先生主張「民權不能爲少數資產階級所專有」，不就是證明嗎？所以「反資本」三字是不應有意不提的。

民權主義既反對資本，那就必然地又反對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的褊狹的民權的。因爲階級鬥爭、無產專政的民權要求，都是資本社會即資產階級的民權的內在的產物。現在民權主義既反對資本，無產專政當然就無從產生了。而陳伯達之不提「反資本」，原因亦就在此。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此民權主義是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非某一階級所得而專，它是國民的民權、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民權。一言以蔽之曰：全民政治！

## 四、關於民生主義

孫中山先生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可見民生主義即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但此社會主義有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不相同的所在。即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階級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雖最後是民族的和世界的，然起點之是階級的，却是事實。民生主義不然，它是國民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故起點不是階級的而為民族的全民的，至終點之與馬克思社會主義相同，自不待說。孫先生說，「民生主義是為四萬萬人謀幸福的主義」，這正證明民生主義是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但又不可誤會，以為民生主義不主張世界幸福的，要知孫先生之為此說，乃是就民生主義的起點言。因為「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孫）離開民族主義而高談世界主義，那是空洞無邊，不着實際。

這樣研究起來，我們知這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是這樣：先由階級福利進到民族福利；次由民族福利進到世界福利，而民生主義的實現過程則跳躍了階級福利，直接由民族福利進到世界福利。

我們看吧，蘇聯現在是由階級的社會主義發展到了民族的社會主義（蘇聯稱之為「一國社會主義」）階段。中國以其後來居上的資格，必「使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孫）因此三民主義的民族國家，即是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中間沒有革命，沒有突變。革命和突變，僅存在於爭取三民主義的民族國家的獨立的過程中。以此，階級的社會主義（無產專政的社會主義）在中國根本無用武之地，因民族主義的民主主義，已把階級的社會主義吸收了過來，沒有獨立性可言。它附屬於民主主義，爲民主主義所有。

關於民主主義的反映過程，那確實是如陳伯達所說的，它是「中國的民主革命的發展乃是世界正臨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的產兒。換言之，「歐美強矣，其民貧困」（孫）的生活情形，「社會革命之運動」，「直接地影響到中山先生關於民主主義的決定」。然陳伯達一轉眼，又說這些背景只是使民主主義有了「憧憬」，僅「主觀上是社會主義」的而已。由歐美那些社會情形所「決定」出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等辦法，仍然只是資本主義的，這些辦法就付諸實踐，結果亦不過是造成「創造資本主義正當發展的基本條件」罷了！

所以，在陳伯達看來，這些「決定」等於沒有「決定」，這即是說，民主主義要歐美無礙！

這種鬼圈子的看法，真個也是辯證法的嗎？在下殊不以爲然！

先講平均地權吧。

封建社會中的土地所有者，一到資本社會、沐浴於商品經濟發展的環境中，他們可一躍而變成富翁，

成爲資本社會中的資產階級，立在壓迫和剝削的地位。此在歐美過去的情形看來，事實雖然如此。所以孫先生說：「經濟發達，土地受影響這種變動，不獨中國爲然，從前各國也有這種事實。不過初時不大注意，沒有去理會，後來變動越大才去理會，便不容易改動，所謂積重難返了」？

但他們那些國家對於土地問題就根本不去理會嗎？不，只不過都是對地價「值百抽一」罷了，而不能實施嚴格的累進稅，尤其不能在地價定了那年之後即將一切高漲的增價都歸公家所有的。爲甚麼不能這樣呢？因爲「歐洲那種大地主，已經養成了很大的勢力……很不容易做到」，喫虧在於沒有防患在先！

現在「中國沒有那種大地主，一般小地主的權力，還不甚大，現在就來解決，還容易做到」。怎樣做法呢？先由地主自定地價報告政府，政府依價抽稅，依價收買。地價定了之後的一切增價，都歸公家所有。

這個辦法，顯然可以防止地主變成富翁，變成剝削的資產階級的，怎末能說平均地權是有助於私有資本主義之發展呢？相反，這只有利於國家資本主義之發展，因爲政府可以將其收入用在國營方面。平均地權固不僅可以消極地減輕人民負擔和防止階級現象之滋長而已也。

同時，國營事業一躍發展，它必然要進入農村收買土地，使土地國有化。國有不是私有，乃公有的。

種。而公有乃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故國有與社會主義接近而不與資本主義接近。陳伯達引列寧的話，說平均地權「只是改變不動產底一切血脈基礎，只是消滅封建式的剝削」，這是上面的見解、機械的見解！自然，我們不否認平均地權「消滅」了「封建式的剝削」，但同時又要知道，它又防止了私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即防止了資產階級的成長。因為中國「改變不動產」，不是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下，而是在國營實業、節制資本的原則下。在前個情形之中「改變不動產」，自然就「變不動產」，消滅了封建剝削，也預防了資本剝削，有一箭雙鷹的作用。陳伯達要將它等量齊觀，一點也不對。很明顯地他在用一般來抹煞特殊，歪曲特殊以將就一般，這完全是效削足適履的辦法，未免有些呆氣！

#### 次講國營實業吧。

陳伯達也許覺得我們太看重國營實業的作用了吧。因他認「這種實施却不是社會主義」。理由呢？是孫先生曾稱頌俾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但實際上這國家社會主義又並「沒有剷除德國貧富」不均的大毛病」，沒有消滅了德國的階級鬥爭」。

在這裏，陳伯達的辯證法實在是太不高明了。這由於他根本沒有讀懂孫先生講俾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一段話。何以言之？第一、孫先生說：俾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是在「防範馬克思那般人所主張的社會主

義」。當時的俾士麥以爲「用政治力去壓迫，便是徒勞無功」。俾士麥要遂其「獨裁」之抱負，便用這個方法去改良一般工人的待遇，「去對付社會黨」，使他們因待遇之提高而不與他來爭權。所以，這是別有作用的「國家社會主義」，有其名無其實。與那以「大同世界」爲目的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比，真是不可以道理計！

第二、孫先生之談到俾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不是意在模仿它，而是在指出俾士麥用此「巧妙的手段，去防止民權，成了民權的障礙」。民權是爲了民生，不是爲民權而民權。從這個推理中告訴我們：不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是反民權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沒有立基在發達的民權上面，這不是民權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正因爲如此，故不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不僅是摧殘了民權，變成了民權的「障礙」；並且變斷了民生，「障礙」了民生，變成了實現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唯一阻力！

所以，如以不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來證明民生主義的國營實業的前途，那是牛頭不對馬嘴！這不是辯證法，而是糊塗：缺乏分析能力！

要認識：孫先生的「國家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民族、民權之解決」之上的「國家社會主義」。換言之，孫先生的國家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民族獨立、民權發達之上的國家社會主義。陳伯達在此亦許要反

駁我道：丕士麥口中的國家社會主義，它不正是建立在民族獨立、民權發達的上面的嗎？這個駁難惟有在機械主義者，才無法答覆。在我們，這是很易為的一回事。因為中國的民族獨立、民權發達，是三民主義的民族獨立與民權發達。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那是如總裁所說的，爲「並世所無的」。根據此「並世所無」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所造成的事實去發展的國家社會主義，怎能會與建立在「並世所有」的民族獨立（資本民族之獨立）和民權發達（資產的民權）之上的國家社會主義（如丕士麥的）相同呢？

總之，陳伯達不懂三民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

其實，他還不懂三民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實在他根本就不懂社會主義。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云者，乃是主張用公有資本（雖最後主張廢棄資本，但那是在世界大同之後才有可能）的生產方法，去代替私有資本的生產方法，並用這方法去消滅私產制度，實現「平均財富」的最終理想或最終目的。但陳伯達却要說：「社會主義本來不是『平均財產』，是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度」。是的，「社會主義……是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度」。可是，「消滅」「私產制度」，是爲的達到「平均財富」的境地啊！雖共產社會不是均產社會，但「共」是爲了便於「均」。實在說來，共產就必

然是均產：均產就必然是共產。陳伯達既知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財富本來是不可能平均的，而且富者會越富，貧者會越貧』，則要社會『財產……可能平均』，顯然是社會主義的事了。如此，那能說『社會主義本來不是『平均財富』呢？』

民生主義是在『預防大資本家之發生』（孫）使『貧富不均的大毛病』（孫）不出現於中國，進而達到『甚麼事都可以共』（孫）的共產世界。這是用預防的方法，去『消滅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度』，非『當衝打銷』（孫）的方法。

中國根本不需要『當衝打銷』的階級鬥爭的方法，如說需要，那也是在將來。但讓階級鬥爭滋長將來，明知其必來而不去預防，這便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希望翻北風』（孫），滑稽之至！民生主義便恰是反對這些的。它主張『防患於未然』，不坐待其至，然其目的之在『消滅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度』則一也。

陳伯達的意思，我們知道，他之說社會主義『是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度』，意在不認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理由呢？是民生主義承認私人企業，對私人企業只『節制』它，而不『打倒』它。因此他的結論是：民生主義不主張『消滅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度』，故不是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不相侷。

這是非常錯誤的！

不問民生主義承認私有企業的範圍和作用，只看見提到「私有」二字，就說這是資本主義，在承認「私產制度」那是太笑話了！

事實告訴我們，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前期，乃至在所謂「國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它都不排斥不妨障公有之運行的私有資本。實在，不妨障公有的私有資本，本不應該排斥，而且有助於公有社會之實現。像蘇聯的接二連三的五個五年計劃吧，雖主導的是國有資本，但私有資本在國有資本之下存在著却是事實，然這並不礙其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誰也不能因爲它那裏有私有財產成分，就說蘇聯是資本主義國家，是「私產制度」的國家的！

民生主義所承認的私有資本，其範圍和作用正與蘇聯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本之要旨也」。

這可見民生主義，是主張以國營去駕馭「私有資本」，使「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私產制度」無由建立。一句話盡之，民生社會中所容許的私有資本，是不妨礙公有原則之實施而且有助於公有原則之實施的私有資本，其情形與蘇聯在計劃經濟中所容許的私有資本，原則上無有不同者。這是應該注意的。

陳伯達認爲實現社會主義須先發達資本主義，有資本經濟作基礎方可，這是對的；但以爲要發達資本，就須是自由放任的，不加節制，聽其發展，讓它去操縱民生計却是很不對。陳伯達認爲要實現社會主義，須反對私有資本，反對私產制度，這也是對的；但以爲一開始社會主義的建設，就須將任何私有資本拔根不留，却是很不對。尤其是在私產制度必須反對，而資本又幼稚，必須發達資本以充實「新共產社會」的經濟基礎的中國；和在共產制度必須歡迎，而產業又幼稚，必須利賴資本去發達產業的中國，上面這兩種態度，都是不完全不妥當的！

雖然陳伯達是在用力否認國營實業的社會主義性，但却又如此承認了：「在一定的特殊的歷史時機或歷史條件下，而把若干企業收歸國有或由國家經營若干大工業，也可能給社會主義的前途以若干便利，這是無可疑問的」。當然，他承認這個是有條件的。什麼條件呢？他說：「要問國有企業是否即社會主義這必要看這社會的基本生產關係以及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者如何，才是可以決定的」。在陳伯達看來，這個「決定」的條件，就是「應該於國家監督之外，加上國民的監督」。

這層，我原則地承認。但這是不成問題的，民權主義的目的，便是在於造成一個「國民的國家」（孫），在此「國民的國家」中去實現民生主義，這不就是不折不扣的「國民的監督」嗎？

陳伯達能看這點，我們很佩服，但一方面又以不士麥那反民權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來與建立在民權主義之上的民生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比擬。那就殊不敢領教！

同時，我們更應知道，在國營實業之下，去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結果，「國民的監督」，乃是國營實業的必然。這麼道理呢？因為在國營工廠中的工人，生活有保障，工作有定時，政府對於工人誘之導之，取「協作」的態度那不僅是良心的驅使，而且是法律的必然，政治的必然。要「迎頭趕上」先進國，使歐美「且隨乎後」，則此種協作共享的精神，必更加因之發揚，貫注在每個國民的腦海中。至於在私營工廠中的工人，因有政府的「監督」，國營工廠作模範，勞資之間亦必不會有甚麼大衝突。這樣一來，工人的地位就提高了。至此必反作用於國營事業和附庸於國營的私營事業。此種相互作用之結果，和平轉變的空氣必然濃厚起來，鮮明起來，乃至「生產關係」和「國家政權」都要漸漸的、不自覺的、在經濟的必然中而「潛移」到勞動者的手裏。使階級鬥爭因以消解於無形的！

這還是就民生主義的國營實業而言「國民的監督」。此外，還有民權主義的必然。民權主義的必然與國營實業、節制資本的必然匯合。「國民的監督」，就完全實現，陳伯達先生！「這是無可疑問的」事啊！

至於陳伯達說民生主義是主體的社會主義，這裏也要給他一個批評。此在陳伯達，主要的理由不過是

爲因民生主義之提出是在中國由封建到資本的過渡階段中的緣故，而科學的社會主義是根據資本社會末期的事實而產生的。用以乘民生主義，自然是「空想」的、「憧憬」的、「主觀」的了。其實，這種觀點，只能用以批評科學的社會主義未產生之前的一切社會主義，施之於民生主義，那就錯誤了。因爲民生主義雖是以中國的資本初期事實作主要根據的，但與過去根據資本初期的事實而幻想成的社會主義理想，却有不同的構成因素在。第一，民生主義是在先進國走到了資本末期之時而產生的；第二，民生主義是在有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時而產生的。自然如具備了這兩個外在的前提條件，而落後國不知自覺地去接受它，借鑑它，那末，雖在資本初期就抱有社會主義的理想，亦仍然只是空想的，沒有科學性可言！

但民生主義却不是如此的。它曾自覺地接受這些先進的事實的教訓與理論的指示，這一看孫先生的「民報紀元節演講詞」即知。爲篇幅計，此處亦恕不摘錄。簡略的，我們讀了「兄弟所主張底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一語，也就可以概見了。

因此，民生主義不是主觀的社會主義，它吸收了反映客觀的社會主義（反映資本末期事實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客觀事實與爲此客觀事實所反映成的客觀的社會主義。說得清楚些，民生主義是用中國資本初期的客觀事實去通過歐洲資本末期的事實和主義而成立的。根據資本初期的客觀事實而構成的民生主義的

社會主義之非空想的，其原因便在此。陳伯達不明白這點，說民生主義是主觀社會主義，那是封建思想和割據思想在主義上的應用！這種人，根本就不配談『國際主義』！實在，陳伯達把產生民生主義的客觀事實限制在中國，不許它與世界發生關係，這就完全是鎖國主義者，不知在落後國該怎樣與國際關係相結合的某人！

## 五 結論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陳伯達不瞭解三民主義的特殊價值，他完全是在用先進國的法碼來在中國量度，在中國『獨斷』！這個法碼，就是馬克思根據先進國的發展道路而求得的進化原則。此進化原則為何？主要的是：封建——資本——社會。中國秉之以這個進化原則，那恰恰是處在資本階段的初期。而三民主義又恰在這時候創立的，因此三民主義應該對給資本階段了。可是，在這三民主義之中，尤其是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它不僅極社會主義的理想，而且有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理想的方法和步驟。那末，這將怎辦呢？異議黨派的願則，其辦理便只有這樣：凡有關社會主義理想的話都是空想的，其方法也不能實踐，惟有助於『私產制度』之發展與建立而已。

自歐戰以來，陳獨逸對於三民主義根本沒有體系的認識和體系的解，合於資本階段的，就把它割取出來；不合於資本階段的，也就聽憑以空想的臆詞，唾棄它了事。……

……然不知學識斷不是由錯進而而來的，也不是由封建而社會，而是由封建而民生。民生社會就是中國最偉大的社會。我們民衆努力實現民生主義，斷得。……

……發展經濟而善。這些對於民生主義說來，真有參考、借鑑和啓示的作用，而不能用來稱呼中國的社會。雖然，沒有典型的資本社會和社會主義理論決不會有此科學的民生主義，但決不能因爲民生主義與資本社會有關，而與社會主義有隔。就說中國也有一個資本階段和一個社會主義階段的。民生主義的工作中，也許有一部份是類似歐洲的資本階段，也許有一部份是類似歐洲的社會階段，然終於是部份的類似，因其部份的類似，就說中國有一個資本階段和一個社會階段，這是很不妥當的。要避免這種不妥當的稱呼，那就只有名之以民生社會。這是我的意見。

……陳伯達則取其部份類似歐洲資本階段的意見，擴而充之，便把三民主義整個地看成是資產階段的理論去。……他所謂三民主義的特殊性，只是說「各國在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實現的程度不等的政治上及土地上的種種方面而言，此外無它意義，無它內容。他們『現在爲擁護貫徹三民主義而奮鬥』，乃是爲的『實現

「接」經過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無產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到來，三民主義的「一勞永逸」性根本就不在他們眼裏！」

我很懷疑，如此的解釋，是否在「違背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呢？凡是真誠擁護三民主義和相信三民主義的人，我想，都很容易看出來吧！

寫於一九三九，七，七抗戰兩週年紀念日。

## 九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

關於民生主義的性質問題，今日討論得異常熱烈，這是很可樂觀的現象。但現在很有些人想利用「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一語來當作宣揚某種思想，從事某些活動的護符。究竟這話有無利用可能，我們實不能不切實研究一下。而本文之企圖，亦便在此。

### 一 先讀總理教言

孫中山先生雖不是辯證法者，却是很能懂得一般與特殊的微妙關係，像他對於民生主義所作的解釋，就是一個證明。雖說並未會明白道出，但他實踐所及，竟無處不暗合這個邏輯，亦云巧矣。現在我就用這個邏輯把他的教言分別錄出來。

#### A：有關民生主義一般性的話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民生主義一講）。

「民生主義究竟是甚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

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同上）。

「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員既是贊成了三民主義便不該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其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同上二講）。

「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甚麼事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甚麼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上）。

（B）有關民生主義特殊性的話：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同上）。

「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同上）。

「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實非純粹共產主義，不過為解決「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本黨同志於此，

便可十分了解：「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不過範圍有大小耳」（見演講集，「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一文）。

（C）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之區別：

「今日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

。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民生主義之講）。

「我們需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問題也要同時注意」（同上三講）。

「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計劃資本是不够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同上二講）。

## 二 理解民生主義的方法

孫中山先生對於民生主義所作的解釋，可說是全抄出在上面了；雖然還有散見於各處者，但，原則地抽象地說的却難在此了。對於這些話，我們須一貫地去研究其邏輯，其關係，務使孫中山先生對於民生主義的一般的看法與特殊的看法都不相衝突，可以統一，這才算得了真解，否則，便不成。

對於闡揚民生主義的文章，近來雖多著，然很少正確的、完全解釋。揆厥原因，大都由於沒有把孫中山先生的教言確實的結果，殊覺可惜。而殘缺不完的見解，亦便種因於此。這種缺殘不完的見解，大概言之，可得兩種。

在有些人讀了孫中山先生對於民生主義的一般的說明時，就覺得：民生主義既就是共產主義，則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就沒有間隔的東西可言了。可是，孫中山却又說是有分別的地方。他們覺得這是很矛

盾的事情，於是對於這些話便祇好閉口不談到它了，爲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政黨，至善之法，祇有關揚有關民生主義的一般性的言詞了。這樣一來，他們便把一般性當作民生主義的整個性去了。共產黨便是如此。

在有些人讀了孫中山先生對民生主義的特殊性的說明時，就覺得：民生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了。辦法既不同，實現的時間又是在將來而不是在現在，則『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語，自然就深覺矛盾之至了。但那是孫中山先生說的，不好批評。那末怎辦呢？要攻擊共產主義者便祇有專憑民生主義的特殊性來交鋒陷敵了。這樣一來，他們便把特殊性當作民生主義的整個性去了。有些三民主義者便是如此。

可是，民生主義是一般與特殊之統一，如果是只見其一般性或只見其特殊性，則都失之殘缺。這樣，又那能見到民生主義的整個內容呢？

不錯，特殊性是民生主義之所以爲中國的社會主義之所在，因此就是有些對於它的一般性不甚了解甚至抱着深閉固拒的態度，依然不失爲三民主義的信徒。這個說法，自然是有理由的。因爲專在一般性上去把握民生主義，其極也，必然是沒有了民生主義，所以，就有益於民生主義的實現說來，寧肯是把握着特殊而失去一般。

這點，在今日表現得非常明顯：僅把握着一般的，變成了反三民主義的，變成了宣傳共產主義的口實；他不會日即於民主主義，相反，他日即於馬克思共產主義去了。僅把握着特殊的，變成了誠實擁護三民主義的，變成了反共產主義的人；他不會日即於共產主義，相反，他日即於民主主義去了。因此在邏輯上，把握了民主主義之特殊的他一定會去反對把握它的一般的，這是民主主義之戰鬥性所使然。一般的說來，在今日發揮這種戰鬥性，實非常必要。惟這固必要，乃是指對付那些僅把握一般性而根本抹煞了其特殊的論客而說的，倘有人能不忘其特殊性去把握它的一般性，那就不可非難了。因為這才是民主主義之全貌啊！這樣，豈惟不可非難，就是那些僅把握了其特殊性的人，亦千萬應該遵循他們去理解、去認識民主主義的一般性呢？因為這才可以說是於民主主義有了全面的認識與理解啊！

但，這樣的把握法，是不是會變成雙重人格去呢？換言之，把握一般和特殊，豈不是於信仰民主主義之外又須信仰共產主義嗎？

這一個問題，可有兩種答覆：國際地看，把握特殊又把握一般，必然是於信仰民主主義之外又信仰共產主義；中國地看，把握一般又把握特殊，一方面把共產主義放在合乎某種國情的場合，使它不在中國宣傳，失去實踐基礎；一方面可以充實民主主義之理論的基礎，使信仰共產之說的人，在中國不必於民主

義外再去信仰馬克斯共產主義。

要而言之，我們歡迎共產主義應不抹煞民生主義的特殊性；反對共產主義應不抹煞民生主義的一般性。共產主義者用一般來反對特殊，抹煞特殊以將就一般時，我們應該反對它；但在用一般來理解特殊、發揮特殊時，我們却應該贊同它。反之，民生主義者無條件地用特殊來反對一般、抹煞一般時，我們應該糾正它；但在用特殊來理解一般、發揮一般時，我們却應該贊同它。

我們必須知道：共產主義是典型的或一般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之產兒，故方法必不能同；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一般的概念是廢除私有、實現公有。在這一點上，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和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相同的。『共產』之稱爲『主義』，是在廢除私有、實現公有、因爲這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共通目的，因此，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定義，既不在階鬥爭論也不在和平轉變論，而是廢除私有、實現公有一點。所謂階級鬥爭論，所謂和平轉變論，要不過是實行廢除私有、實現公有的兩個不同的方法或手段而已。這種不同的方法或手段，乃是不同的歷史與環境所決定的特殊形態，它本身即方法本身並不能稱爲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因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不以方法、手段之相異而失去其意義，就拿民生主義說吧。它並不因爲方法不是階級鬥爭的就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故只要把方法和目的分別清楚了，民生主義

之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就一點也不成問題。

我們而欲理解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關係，這個理由就不能不與深切的注意。

今日大家所說的共產主義，大體都是指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因之，我們所謂把握民生主義的一般性，便是說把民生主義與馬克思共產主義相同的目的性；所謂把握民生主義的特殊性，便是說把握民生主義與馬克思共產主義不相同的方法性。

這是民生主義之邏輯的必然，爲孫中山先生用力闡明之所在。何以見得呢？

誰也知道，馬克思共產主義是科學的，爲真理；而共產主義之目的是在廢除私有，實現公有，亦已如上述。但這點孫中山先生曾承認它有普遍的實踐性，將來可以及於世界各國，達到大同世界。然則，馬克思共產主義之目的性，雖在中國又豈可反對？這是一。

孫中山先生雖曾說中國將來共產，不能採用馬克思的辦法，但他却曾說過它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踐性，然則，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方法，又豈可無條件的反對嗎？這是二。

真的，就共產主義之目的而說，我們是國別（中國在內）地即無條件地贊成的；就共產主義的方法而說，我們是國別地即有條件地贊成的。因此，我們反對馬克思共產主義只及於其方法而不及於其目的。要

是連目的都一概反對，那就糟天下之大糕了。因為這是在對準着民生主義之「最高理想」開炮啊！誰不知道，誰不應該知道，「民生主義的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夠共產」，即廢除私有、實現公有呢？

我認爲三民主義者對於這點是應該肯定的，如不肯定這點，那我們便拿不出理由來反對共產黨了！

在中國，共產黨之應反對，大家都認爲是天經地義毫無疑問；但我們不能不指出：反對共產黨，是反對它在中國使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共產主義之特殊的方法，不是反對廢除私有、實現公有的共產目的。同時，反對方法，也並不是不要方法或不注意方法，而是因爲中國已有另一套切合國情的特殊方法代替了它，不必削足適履地去拜倒於馬克思方法之下了。反對共產黨的人，請注意於此。

這是認識民生主義乃至整個的三民主義的一個方法。現在請看不懂這個方法的人所發出的一切錯誤殘缺的見解吧！

### 三 修改與利用

沒有把握民生主義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的人，以爲「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話，語病甚大，國民黨人應與以修改。記得羅隆基先生在一論中國之共產」一文中便是這樣說，他甚至以爲中國共產黨之坐大，

皆應由此語負責，這殊不像是個學者的口吻！

兼民生主義確實就是共產主義，你能改成『民生主義不是共產主義』嗎？是的，如共產主義是指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那末，就民生主義的特殊性而言，它確然不是共產主義。但孫中山先生口中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並不是單指馬克思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一看民生主義的『定義』便知道了，他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倘能達到這個目的，便是在實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總之，孫中山口中的共產主義，只是『甚麼事都可以共』的意思，並不單指馬克思共產主義；雖然馬克思共產之目的，仍不外是做到孫中山先生所下的定義而已。因此就退一步承認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共產主義是指的馬克思共產主義，但也因爲它的目的依然是在使『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達到圓滿解決的緣故。這是很明白的，他用這個意義去包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至大同主義的任務，便是一個證明。

然則，民生主義又怎的不是共產主義呢？祇要不把共產主義送給階級鬥爭論者去獨裁包辦的人，他是應該承認的。那末，又怎能修改呢？

或曰『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應改爲『民生主義就是社會政策』。這個能否成立呢？不能。

社會政策是站在資本家方面的改良主義，目的不是打倒資本家，推翻資本制度；而是愛護資本家，維持資本制度，使之長治久安。至於民主主義呢？那就完全相反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只是防微杜漸的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使資本家不能滋長，私有制度不能發展，階級鬥爭無由產生，做到『衆人能夠共產』的境地。所以共產才是民主主義的最高理想。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社會『到了共產時代，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便不致於爭，便可免去人與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而民主主義恰正是實現最高理想的共產主義的系統的嚮導理論。所以他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主主義是共產的實行』。這樣，民主主義自然就不是社會政策了。須知孫中山先生說『民主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是其最終目的而言；要達到這個目的，自然要有實現它的辦法，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就是具體的辦法。請問：把實行民主主義的最高理想的辦法，當作了民主主義的目的，那裏可以呢？這不是把局部當作了全體嗎？

因此，『民主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語，修改不得。

但，說『民主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是不是足爲共產黨利用呢？絕對不會！不但不會，有了這句話，共產黨在中國根本就應該消滅。何以呢？因民主主義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不必於民主主義外再去信仰共產

主義了。甚麼叫做民生主義的共產主義呢？它是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爲方法的共產主義。甚麼是外於民生主義呢？它是以階級鬥爭、打倒資本家、奪取生產工具爲方法的共產主義。前者以防止階級鬥爭爲特徵，所以是和平的；後者以主張階級鬥爭爲特徵，所以是暴力的。中國將來之鬥爭，既事先思慮預防，那末階級鬥爭論，就自不需要了。階級鬥爭論既不需要，而共產又是民生主義的終極理想與終極目的，那末，信仰外於民生主義的共產主義，這不是畫蛇添足之舉嗎？

我不妨再詳言之：民生主義是和平、漸進的共產主義，是生產與分配同時注意的共產主義；馬克思共產主義是鬥爭，突進的共產主義，是奪取生產工具側重分配制度向共產主義。既「和平」了，就沒有「鬥爭」了。既「漸進」了，就沒有「突進」；既「同時注意」了，就沒有「奪取」。「鬥爭」、「突進」、「奪取」的客觀事實都沒有了，何有於以這些爲特徵的共產主義呢？

所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語，利用不得。

#### 四 兩者底實踐範圍

我覺得；孫中山主義是「將來」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現在」的共產主義。這個分別法對不對

呢？依照孫中山此語：「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看來，則此種分法是很對的。

達到需要「現在」共產主義的國家，那它必定是資本主義極端發達帶上了帝國主義的姿容的，在那裏因為是生產發達，貨財過剩，貧富懸殊，故其患不在「寡」而在「不均」；凡欲從「不均」而進於「均」，其解決途徑，只好是促成鬥爭，從事奪取，實行無產專政了。達到需要「將來」共產主義的國家，那它必定是尚處在由封建到資本或處在資本初期中的。在那裏生產落後，貨財不足，階級不明，故其患不在「不均」而在「寡」；凡欲從「寡」以進於「足」，且在「足」的過程中冀以避免先進國那種由「不均」所滋生的一切矛盾和鬥爭，其解決途徑，只好是趁階級未分明之時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並國營實業冀以消弭鬥爭，避免奪取，而自始就實行國民合作了。

在這裏也看出，作為將來共產主義的民生主義，絕不需乎「現在」共產主義之方法；這個不需要，是兩者的實踐範圍所決定的。

怎末說這是兩者的實踐範圍所決定的呢。

先須知道，民生主義的「共將來」云者，乃是就它的最後任務而言。在這一任務尚未到來之前，還有民生主義的前一個任務待做。雖然，這兩個任務沒有劃然的界限，其自前一個任務到後一個任務之間是

一貫的漸進精神。但嚴格的說起來，在實現民生主義的過程中，終於各有其偏重之處。因此說民生主義是有兩個任務，還是恰當的。民生主義既然有兩個任務了，其共產任務只是其中的一個。那末倘有人抹煞它前一個任務並引孫中山先生的『共將來』一語作證說：民生主義是明日共產主義！且從而推斷說：既然是明日共產主義了，而中國『現在』不能共產又爲民生主義所肯定，那末就祇有待至明日可以共產的時候來講民生主義、來實踐民生主義了。

這當然是錯誤的判詞。

這個錯誤，是由於把它看做『純粹共產主義』去了。不知民生主義的明日共產或將來共產的經濟條件是民生主義的前一個任務所造成的。故中國之共產雖然是將來，而目前的工作仍然是屬於民生主義範圍內的工作，這當中切不可做爲劃分；若是劃分，民生主義的和平轉變論都無法成立了，此不能不注意。

民生主義爲甚麼會有兩個任務呢？簡言之，因爲它是高級的共產主義的緣故。高級的共產主義，不能不發達資本充實生產。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要將來實行共產，現在的工作『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要發達國家資本』。可知，民生主義雖主張共產却又主張發達資本的，這就使得它不能一肩挑起生產與分配的雙重使命了！

這兩個任務是互相影響的，有不可分性。而認真說來，前一個任務是爲後一個任務而有的，換言之，後一個任務是前一個任務之目的，前一個任務是後一個任務的手段。

從此我們知道，民生主義之在後進國，絕不是僅僅憧憬將來共產，有理想而無辦法的架空的幻想。不，民生主義是意識地創造共產經濟共產後的共產主義。它之特徵是不止於共產，而且還要意識地創造實現共產社會的經濟條件。此爲民生主義的共產主義與非民生主義的共產主義之不同的顯著點。像馬克斯共產主義，原只注意於共產，而未注意於創造實現共產社會之經濟條件。這由於馬克斯共產主義是產生於資本主義達到了高度發展的國度中的緣故。在這種國度裏，其共產之經濟條件，已爲資本主義社會非意識地創造出來了。孫中山先生之「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不過範圍有大小耳」一語，便是從這種分析中得出的結論。意思是說：民生主義的「範圍」『大』；共產主義「範圍」『小』。民生主義範圍之大，大在它要意識地實現共產社會之經濟基礎；共產主義範圍之小，小在它已有了現成的，經由資本社會非意識地創造出來的共產經濟基礎。因之，民生主義包括了共產主義的任務，共產主義却沒有包括民生主義的任務。同時，因造成共產經濟基礎有意識與非意識之分，故由非意識的經濟基礎走到共產社會之一套辦法，對於正在意識地創造共產經濟基礎的國度裏，就完全是隔靴搔癢的東西了，一點也用不着！

所以，「民主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外於民主主義的共產主義，絕不應該存在於中國。

### 五 誰是「純粹共產主義」

上面說了「共產」祇是民主主義的最終任務，而不是民主主義的整個內容。它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不是「純粹共產主義」，其不是「純粹共產主義」，就是前節中所說的，它還要意識地創造共產生活的經濟基礎。

中國具體地覺悟共產，是在由封建到資本的過程中或資本初期中，因而意識的創造就代替了非意識的創造了。也正因為這個道理，故民主主義實踐範圍也就隨之「大」起來。就空間說，它之「大」，在乎擁有中國的資本階級。

「純粹的共產主義」，像馬克思的則不然了，它的實踐範圍不會擁有資本階段，而是資本階段行將崩潰瓦解之時的催生者。因之，純粹共產主義對於資本階段來，是破壞的；非純粹共產主義如民主主義對於資本階段說來，卻是建設的。

還有，實現「純粹共產主義」（或如我所說為現在共產主義），是以資本發達的成熟程度為限界，不

以階級鬥爭或階級專政爲限界。因爲打着「純粹共產主義」的旗子，以階級鬥爭的方式開闢了社會主義社會之路的國家，不一定能夠格實行「純粹共產主義」。這個，蘇聯當時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經濟狀態，便是好例。故孫中山在民國十三年時說：「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實非「純粹共產主義」不過爲解決「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此證明俄國之未實行「純粹共產主義」。原因何在？依我在上面的說法，則是下面這個道理：在蘇聯實踐上雖是執行「純粹共產主義的」方法從事社會革命。換言之蘇聯在形式上雖會由階級鬥爭達到無產專政的目的；但這個目的達到後，實際上却並未實現「純粹共產主義」，繼這個目的而來的是新經濟政策。執行新經濟政策，當然不是在共產，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不過爲解決「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這個「政策」的目的，即是意識地創造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

蘇聯這個新經濟政策給我們以何種教訓呢？就是：凡尙未具備共產經濟基礎的國家，雖就是採用共產主義的辦法去共產，依然是事與願違的；要共產還得用新經濟政策去意識地補足非意識的共產經濟基礎。因此，在蘇聯當時，共產主義自共產主義，無產專政的結果，對於純粹資本家和企業家還是要寬容他，使他們爲共產的基石努力工作。其新經濟政策就是一方面用國家力量去意識地豐富共產經濟；一方面又用新經濟政策以約束之，鼓勵私人資本發展私人企業。在前種場合，就很像民生主義中之國營實業辦法；在後

權結合，就很像民生主義中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辦法。

寫至此，我真不能佩服孫中山先生的創造天才與預見能力了！

所以，我們如果祇注意到現象而忽視它的本質，以為俄國既是用馬克思的辦法打開了社會主義之門，其所實行的就一定是一「共產主義」（或說純粹共產主義），那是見樹子而不見森林，非常錯誤！實在，共產主義在蘇聯也成爲將來共產主義了！有趣得很，它那社會主義的國家，雖是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打開的，可是，實際上却走到我們民生主義之路土來了！你看它的新經濟政策，彷彿是民生主義的前一個任務，將來共產，就彷彿是民生主義的後一個任務呢？這真是「天作之合」！

照邏輯講，階級鬥爭所得的應該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局面；然而不，蘇聯所得的却是一個民生主義的局面；那末，在有了民生主義的中國，並有了實踐民生主義的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還要明知故犯的去再踏蘇聯階級鬥爭之覆轍，就真個蠢不可救了！不過，在這些人也說是在「信仰三民主義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的今日，那我就請他來洗耳靜聽下面一段話。這是孫中山先生的，他說：「我們講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却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就

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末能夠比得上呢？又怎末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所以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

惟知機械地搬運主義，高談空洞理論，而不知客觀地去體驗事實，實踐地去證實其主義理論的人，聽了這話，能無愧色嗎？

蘇聯當時無特殊的共產的主義（民生主義）以適應其國情，僅懷理想社會之心勝過一切，惟有全盤抄襲馬克思共產主義來行社會革命，結果雖相反的走到民生主義方面來了，我們還應原諒它。而今日中國呢？它是已有切合國情的特殊的共產主義了，並且還有蘇聯的革命經驗證實了它的正確，倘有人還不大徹大悟，覺悟迷途，那末，爲了中國人民，爲了社會主義，爲了大同世界乃至爲了讀書人的恥辱和思想史上的污點，我們都非得『鳴鼓而攻之』不可！況且乎『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比俄國還落後呢？

所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外於民生主義的共產主義，絕不適合於中國！

由以上各節之所論，我們知道，『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語毫無利用之可能。有了它依照馬克思共產主義組織的共產黨，根本就失去了理論上的根據。因爲『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均包括……』在

民主主義之中啊！主義既『包括其中』了，政黨還不應合併嗎？這是很自然的邏輯！然則，抹煞民主主義的特性殊而單咬著民主主義的一般性來橫扯，又那能成功呢？不過愈益暴露其用心而已！休哉！

一九三八，十二。二九於重慶

## 十 民主主義怎樣與共產主義做朋友

中國共產黨雖曾宣言說『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願爲其澈底實現而奮鬥』。而一究其實，却是口是心非，別具肝腸！就他們的國際主義立場之必須打倒帝國主義而言，可以說是信仰民族主義，就他們利用民主口號以發展其勢力，鞏固其紅色割據而言，可以說是信仰民權主義；就他們欲憑『改善人民生活』等空洞言詞來騙取民衆而言，可以說是信仰民生主義。

因此，他們信仰三民主義，其目的是在暗算國民黨發展共產黨。

他們爲甚麼這樣幹呢？就因爲三民主義在他們的眼裏是資產階級的主義，國民黨在他們的眼裏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不過，在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飛躍』不出這歷史階段的時候，也覺得這是歷史上的一個進步，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究竟比封建社會好啊！

這便是他們宣言信仰三民主義的原由。從而他們的形式邏輯就傾筐倒篋的拿出來了！他們說：三民主義既是資產階級的主義，國民黨既是資產階級的政黨；那末將來的社會階段，自然就是共產黨的世界了。然則共產黨爲了中國人民怎可不保全其獨立的組織呢？他們於是振振有詞了。

所以，就這點說，他們信仰三民主義，乃是以共產黨的資格站在資本階段的進步性上來信仰三民主義。他們認為民族主義中的民族只是資產階段的民族；民權主義中的民權，只是資產階級的民權；民生主義中的民生，只是資產階級的民生而已。三民主義中的民族、民權、民生，其意義是否如此單純，我們可不管它，然共產黨在這樣地抹煞它的涵義使其片面化却是事實。因此，他們雖承認孫中山是劃時代的人物，三民主義是劃時代的主義、國民黨是劃時代的政黨。可是這個『劃』，是把它緊緊局限在資本階段之內，而將來之社會階段却還得讓他們用馬克思的辦法來『劃』的。這種『承認』當然是非常之不夠的。我們倘不明瞭他們禮讚孫中山、禮讚三民主義和禮讚國民黨的立場及其限度而惟滿足於其詞句，那是會受大當的。我們可不能不注意。

他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成見，就是無產大眾的『民族』與無產大眾的『民權』和『民生』，都須在社會主義的實現中。例子呢？是蘇聯。

他們既有這個成見，其對於三民主義抱敵對的態度去看待它，那是必然的。殊不知三民主義已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包括其中』，因而三民主義已把劃社會階段的工作兼併在劃資本階段的一個革命過程中了。換言之，三民主義是『雙胎』的主義；國民黨是『雙胎』的黨。這點他們不承認也不理解。因為不承

認也不理解，故今日之投降完全是虛假的，乃是勢逼處此，並非誠意。

本來，在共產主義者的慧眼中，日本帝國主義固應打倒，但中國的資產階級，（有不有？不管。這完全是將就共產黨的看法）也一樣的應該打倒。不如此，在他們的意見看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應先打倒中國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打倒了，然後才可用無產專政的國家力量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可是，事情不如他們的幻想願望，他們口號中的中國資產階級不俾沒有打倒而且快要打倒它的共產黨打倒了。

在這個時候，他們沒有辦法，只好是大呼救命了！結果是跪倒在三民主義的跟前，輸誠受命。但真的就信仰三民主義了嗎？沒有，一點也沒有。脚跟一經站住，就又傲慢起來了，於是又對部下施法道；我們原是欲把國民黨撲滅之後，來獨自對付日帝國主義者，無奈日帝國主義者竟於我們的目的尚未達到之前就來向我中國屠殺了。我們感於『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義故毅然放棄過去政策，實行團結國民黨成立統一戰線以對付共同的敵人。雖然這樣不便宜了國民黨，但究竟比便宜了日本帝國主義要好。何況乎我們共產黨也可於此得到一個透氣的機會呢！但是，要把這基礎打鞏，便不能不宣言信仰三民主義以取得國民黨的信任。何況乎這信仰也是於我們有利的呢？因為無產階級的民族國家，是所自有產階級的民族國家；無產階級的民權國家，是出自有產階級的民權國家；無產階級的民生國家，是出自有產階級的民生國家；

中啊！如此，信仰三民主義正是有百利而無一弊呢！

但是，三民主義究竟不是資本主義，這個『不是』，是非常顯明的，在三民主義中，有一貫的理論可考。共產黨雖用全力來穿窬附會，亦曲解不成功。他們沒有辦法，只得盡量搜羅有關三民主義一般性話來掩護自己的野心了。那些話呢？如下：

『民主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民主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員既是贊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毫無衝突』。

『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能說是和民主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

他們把這些話，大引特引，簡直把三民主義裝填成共產主義的面目去了。何曾知道這些話是就三民主義的一般性而言，它除了其一般性之外，還有其特殊性在呢？

他們爲甚麼要揀絲三民主義的特殊性？因爲要是把三民主義的特殊性高揚起來，共產主義之在中國就好像是雲遮著太陽一樣，要完全消解。

那末，民主主義到底怎樣與共產主義做朋友呢？

誠然，孫中山先生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可以與共產主義做朋友的許許多多的話，這是事實，誰也不能不承認。可是，這都是就民生主義的一般性而言。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它的共通性是在廢除私有、實現公有；而民生主義的最終目的正是如此。因此他說民生主義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就是共產主義，可以與它做朋友。不過這個共通點是抽象的，是一般的，基於各國的情形之不同，要實現它，須有具體的特殊的方法。在這一點上，民生主義的共產方法却完全不同於馬克思共產方法了。

從而我們知道，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做朋友是在它的一般性。而不在它的特殊性；「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語，固是這個意思，「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毫無衝突」一語，也還是這個意思。

剛才說過，要主義實現，須有辦法；沒有辦法的主義，祇是空想不得實現。馬克思共產主義是有辦法的主義，孫中山民生主義也是有辦法的主義。但兩個人的辦法，可說是南轅北轍，絕不相同。中國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孫中山先生說得很決斷，他說「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民生主義的共產辦法。這樣看來，民生主義在目的上雖是共產主義的好朋友，「國民黨員……不應反對」；然在方法上却不能做朋友了。倘有人曲解民生主義的方法使它與共產主義的方法混為一談，那我們就應起而反對。

實在，如果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除目的相同外，其方法也相同的話，那就絕對同一了，這樣，民生主義根本就是共產主義之重複，有一便足，何用孫中山先生苦心孤詣地去創造呢？

所以這種抹煞民生主義的特殊性勉強要它在方法上也與共產主義去做朋友的勾當，我們應力加反對，反對的唯一武器，便是高揚民生主義的特殊的方法性。

孫中山先生說：「我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個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爲甚麼說「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呢？因爲都是主張共產。爲甚麼說「要分別的……是在方法」呢？這可非三言兩語所能答覆了。因爲構成方法有種種原因。就歷史階段說，馬克思共產主義是在資本階段末期，孫中山民生主義是在資本階段初期；就經濟基礎說，馬克思共產主義是處在資本發達、生產過剩之時，孫中山主義是處在資本貧乏、生產不足之時；就階級情形說，前者貧富懸殊、階級分化，後者貧富含混、階級不明；就時間性上說，馬克思共產主義是現在共產主義，孫中山民生主義，是將來共產主義。這樣，就復明白了，處在資本初期的孫中山民生主義，它要注意生產和分配兩者，防止階級分化，造成將來共產之局面。處在資本末期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它只專注重分配。但要分配社會化，就必須用被壓迫的貧

窮難變來向壓迫階級鬥爭，這以奪取政權造成現在共產的局而。

所以，共產的方法，是在一定的歷史階級、一定的經濟基礎、一定的階級情形之下決定的。由於歷史階段、經濟基礎、階級情形的不同，故共產方法有馬克思階級鬥爭論與孫中山和平轉變論之分。民生主義的歷史階段、經濟基礎和階級情形既了同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則在方法上之不能做朋友，那還不是肯定的嗎？你看，這在孫中山先生是說得多麼明白啊！他說：『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它，現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便用不着』。可見，所謂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好朋友』，『毫不衝突』云云，完全是就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目的相同一點而說了。但，共產主義之目的，既已包括在民生之中了，而名的方法又犯不着，則外於民生主義去信仰馬克思共產主義並根據其主義去組織的共產黨，豈不是一個多餘的贅瘤了嗎？

但，共產黨人要狡辯，他們說：『以爲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是不能並存的，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看法。共產主義是革命發展的將來階級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這話，理由有多少，試分析一下看吧。

(一)『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能不能並存的嗎？』

不能，絕對不能！因爲三民主義把共產主義的一般性（指實現公有，廢除私有一點）統一於民生主義之中了，對於共產主義的特殊方法，則已與以拋棄。「並存」的共產主義是原封原樣的共產主義，把共產主義的方法也「並存」在中國了、這是不需要的。所以「並存」不得。

（二）說「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是不能並存的，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看法」嗎？

不是，絕對不是！以爲中國的資本階段，一定就是先進國的資本階段；以爲中國將來的社會階段，一定就是俄國的社會階段，這才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看法」。三民主義不然，在原則上它承認中國有一個資本階段，但它是特殊的、變形的，發達資本的結果，不會釀致貧富的兩極，階級的對立。在原則上它也承認中國有一個社會階段，但它是特殊的、變形的，走到共產社會，毋須流血使用暴力，這個不流血，不使用暴力，是中國資本階段的特殊性所造成的形態。所以，這是統一一般與特殊的辯證的看法，反乎這個看法的，才是「形式主義」者。

（三）「共產主義是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嗎？

不是，絕對不是！在先進國，「將來階段」是需要用「革命發展」的方法去實現「共產主義」的。但在中國却不需要。因爲三民主義已有和平轉變的方法進到「將來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了，一點也用

不着「革命發展」。民生主義的共產主義，是「生理」的共產主義，你們難道不知道嗎？既然「生理」地達到了，「病理」的階級鬥爭還要他幹嗎呢？

（四）你們「現在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嗎？

這是好的！因為由「夢想實現」到「不夢想實現」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你們「現在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的今日，我請你們記起孫中山先生的「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的名言。因為這話可以告誡你們：將來共產，不是你們共產主義者的任務而是三民主義者的任務。而且民生主義與共產從將來，民生主義的將來共產只是它最後的任務，在這任務未到之前它還要不背離後任勤勤的去盡義務資本。所以，它沒有坐待革命的時候。因為它沒有坐待革命的時候，故由資本到社會，始終是兩個漸變共產黨就是存在了，將來也找尋不出「革命發展」的階段。那時，共產黨將滅於無聲無臭之中。雙輪轉罷，生產主義完成了吞嚥了共產主義的任務！

總之，共產主義在中國，自始至終沒有它的任務。共產主義的辦法，如階級鬥爭，無產黨應在初期資本初期，根本就沒有它的用武之地。到已由資本初期大踏步向前而趨，如無適當之辦法，階級鬥爭、無產黨或將出現於中國；但，中國已有天才的孫中山先生想出了預防的法子，其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國黨黨，就是防止階級滋長，無產專政的完善辦法。至於共產主義的最終任務，如消滅階級而實行共產，又已是民生主義的最高理想了，也不需要另起爐灶的共產黨！

惟認共產黨：中國所需要生理的，民生主義的共產主義，不需要病理的、階級鬥爭的共產黨。這是一條道理，爲國人所應「共信」的。

共產黨與共產黨，就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目的相比，它們的確是同以廢除私有、實現公有爲最高理想的。在這裏，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果然「毫不相衝突」，「是好朋友」。但共產主義要有方法，共產黨的方法既不需要，那末，共產黨就是一個沒有方法。空想集團了。要想中國共產並效用方法達到也「空想」，不把空想的集團，爲實踐的政黨。而要變爲實踐的政黨，就只有用民生主義的方法。這纔是來路。這纔是「自然而然的走上合併的途徑了。」

共產主義如欲與民生主義做一個天長地久的朋友，這是一條康莊的大道，否則，便有背做朋黨的嫌疑。共產黨了，吾國共產黨人三復斯言！

## 十一 孫中山先生的和平轉變論

本報特刊  
官從民生問題出發

甚麼是和平轉變論？就是說，中國由資本到社會不必採用階級鬥爭的方式，以其國內和國外的種種客觀條件之具備，它可以是和平地轉變過來，把社會革命畢之於中國由封建到資本的一個革命過程中。

而和平轉變論便是代替和消弭那未來的社會革命的一劑針對的方法。故和平轉變是民生主義的共產方法，而階級鬥爭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共產方法一樣。而依孫中山先生的看法，民生主義固是解決民生問題的主義，即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也是解決「民生問題」的主義。這樣看來，那末和平轉變論便是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的一個實踐理論了。但這個「民生問題」的解決，或這個解決「民生問題」的和平轉變方法，是不是達到社會主義世界的唯一的橋樑呢？

說到這裏，我們便不能不把「民生問題」鬧一個清楚，看孫中山先生所謂「民生問題」究竟指哪一個社會階段。把「民生問題」的社會階段弄清了，我們才可以知道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和平轉變方法，

是唯劃那一個社會階段的橋樑。

孫中山先生說：「民生問題是社會問題的本題。他爲『正本清源』計，故把『社會問題』改稱『民生問題』。但社會爲甚麼會成爲問題呢？這是因人民的生活成爲了問題的緣故。人民的生活之所以會成爲問題，則是因爲經濟問題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故歸根結底說來，『民生問題』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的因。『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是『民生問題』的果。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民生』是事實，『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是現象，由『民生』而導出。注意『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便是注意民生問題。因此，解決社會問題或解決經濟問題的主義，便可以說是民生主義。

但，民生問題不自今日始，它是『古已有之』的。他所說的『民生問題』以及解決民生問題的『民生主義』，究竟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呢？孫中山先生說：『就歷史上講：何以有『民生主義』呢？就由於社會上貧富不均。甚麼是貧富不均呢？古時雖然有貧富階級的分別，但是沒有今日的利害。今日貧富懸殊，不可方物，正所謂富者敵國貧者無立錫之地！其所以養成這貧富不均的現象，就是古今的生產力不同！』這樣看來，則他所謂『民生問題』以至解決『民生問題』的『民生主義』都是狹義的，有其一定的範圍。這點，我們還可從如次的一句話看出：『歐洲當二百年前，爲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來，爲政治革



這階段的改私人資本主義爲國家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階段的辦法）而不是爲了資本階級來改資本階級的相級，是爲了社會階級來改良資本階段的，所以這個和平轉變的辦法，一經逐漸實現，它就導即於社會階段的境界了。

經過這樣充實的結果，就知和平轉變辦法是從民生問題出發，以解決民生問題爲它的歸結，它是處在由資本階到社會的階中。在這一點看來，有如階級鬥爭論是處在由資本到社會的中間一樣，蘇亦有不調之點在，且向階級鬥爭論之由資本到社會，是指由資本末期到社會初期，和平轉變論則是由蘇維末期到資本初期，且有變異把它看作蘇維資本階段的改良辦法，也就是由於個執此「資本極期」三點而來。這當然足形我邏輯的善法，現在我姑且將圖來表其區別如次：

封建末期—資本初期

和平轉變論

資本末期—社會初期

階級鬥爭論

這道理，和平轉變論才與孫中山先生對民生問題之的解釋，我，得到了統一。從前我們對於兩者解決民生問題的關係，是清楚了的。因爲我們是以把這圖作成次圖，而得出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的圖。

資本末期—資本初期

民生問題

資本末期—社會初期

民生問題

中國之所以能在資本初期發注意到『民生問題』，却是因為先進國在資本末期提出了『民生問題』的結果。所以，中國的民生問題是由先進國所引發。要指出這種關係，圖式就該如次圖(一)。但先進國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是階級鬥爭論，因此就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而說，中國之和平轉變論是爲階級鬥爭論所取代。要指出這種關係，圖式就是次圖(二)。

資本末期—社會初期

(一) 民生問題

資本末期—資本初期

民生問題

資本末期—社會初期

(二) 階級鬥爭論

資本末期—資本初期

階級鬥爭論

這樣中國的『民生問題』就統一了歐洲的『民生問題』！中國的和平轉變論，就統一了歐洲的階級鬥爭論。總之，『資本末期—社會初期』，是引起民生問題的『一般』事實，『資本末期—社會初期』是

引起民。陳的「特殊」事實，而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民生主義」則可以說是統一或綜合一般事實與特殊事實的主義了。照清見解，可以寫成圖：



又可以簡寫成次圖：

二般的事實 + 特殊的事實 = 民生主義

亦即可寫成次圖：民生主義 = 一般的事實 + 特殊的事實

此項法則與社會主義的理論相符合，且與中國民生問題相符合。由以上兩圖可見，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理論相符合，且與中國民生問題相符合。由以上兩圖可見，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理論相符合，且與中國民生問題相符合。

思社會主義的，為馬克思社會主義所有。而馬克思社會主義是資本社會末期（主要的反映背景）之反映結果，那末民生主義就是根據中國事實再去根據歐洲事實和社會主義理論之綜合而得出了。如次圖：

這

歐洲事實  
社會主義——中國事實——民生主義

簡認爲「民生主義」是以中國事實爲主要根據，它本身就代表了中國事實可以不列，則亦可簡寫成次圖：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生主義

現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有了蘇聯。這在孫中山先生看來，主觀上雖是採用階級鬥爭的辦法，客觀上却對階級鬥爭的辦法曾與以拋棄。而中國却正需拋棄階級鬥爭的辦法（代以和平轉變的辦法）去實現社會主義。那末現在用主觀上不會拋棄階級鬥爭辦法的蘇聯來代替須奧伏赫的社會主義，則我們列成次圖，亦很恰當。

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  
中國社會——民生社會

簡寫成則如次：

資本社會——共產社會——民生社會

總結則是：中國的民生社會是歐洲的資本社會和蘇聯的共產社會之一奧伏赫變。這是就社會形體說。就

重影形說，寫成圖則如次：

歐洲的資本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民生主義

這就顯明是：中國的民生主義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之一奧伏赫變。

但上面兩個式子沒有列出中國事實，即沒有列出中國由封建到資本的事實。這可不可以呢？可以。因為沒有忘記把資本社會和共產社會給予奧伏赫變，這就是沒有忘記中國的特殊事實。須知奧伏赫變是由中國的特殊事實出發。換言之，此奧伏赫變是為中國而奧伏赫變，所以奧伏赫變中就有了中國，不列舉它，而中國亦自在其中。這是欲認識民生主義的綜合性者所不能不注意的。

據綱要中，它是中國的共產方法

與五

和平轉變為甚麼是中國的共產方法呢？要解答這點就不能不知道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而要知道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就應該知道孫中山先生怎樣去分析產生共產主義之產生背景。

共產主義是怎樣產生的呢？孫中山先生曾用經濟學的觀點道過，「就是因為古今的生產力不同」。

歐美入當時以為政治平等、人民自由、工業發達，便是黃金世界，甚麼問題都解決了。不料到了工商業發

資本主義，僅生出「大資本家」，他們用金錢勢力，操縱全國政權，遇事都是居於優勝地位」，以此「生出貧富的懸殊，釀成經濟革命」。這個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純是由於「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緣故」，要解決這「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民生」問題，於是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便應運而生了。

但，凡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就能解決民生問題嗎？不然，歷史上有種種所謂社會主義，它從來不能解決民生問題。不過，那是空想的社會主義。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主要的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因為祇有它才夠格解決資本社會所造成的民生問題。此外的都是殘缺不完的理论，根本就沒有「民生」問題。社會主義是個切實的東西，並非甚麼東西都沒有認識，其所由構造成的改造方案又怎樣實踐呢？這是當然注意的問題，豈不覺！

### ——請聽回來。——

剛才說了「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而「民生」之會成爲問題並成爲思想主潮，是因爲貧富懸殊，生產力變動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貧富兩極，社會上釀成對立的階級現象。故民生問題之解決，豈便不能不從階級對立的消滅而擴言之，要解決這個民生問題，便不能不打倒富者階級，救出貧窮階級，使富者和貧者之間的鴻溝化除而共同過着平等的經濟生活。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廢除私有，實現社會主義。

會主義的共產主義，他的目的也便是私有社會的廢除，公有社會的實現。因之，它成爲了本質解決民生問題的總原理論，有精神武器的作用。

孫中山先生既然沒有否認社會問題，全然也就不會否認社會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這種共產主義。他不過說：「民生問題是社會問題的本題」而已。因之他的「民生主義」也不過是特以「社會問題的本題」——「民生」來稱呼他解決「社會問題」的主義罷了。我們倘不在這上面去「正本清源」；那末，民生主義實則就是不會「正本清源」的「社會主義」。孫先生在把「廢除私有、實現公有」的社會主義「正名真義」之後，他主張「用民生主義代替社會主義」；這便是他把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主義稱作「民生主義」的由來。

現在一般人都聽慣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聽見甚麼「民生主義」，總覺得希奇不願耳，不僅覺得不願耳，而且把「民生主義」看成是與「社會主義」對立的惡想體系去了！這種人那配講實主義。中山先生的意思，原是想把「社會主義」這名稱，弄得更加切合事實和切合主義的使命。不謂這樣一來，不僅不能使人認「社會主義」便是「民生主義」，而且使人認「民生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去了。這未免大有背乎孫中山先生的初心！

我們要知道孫中山先生之主張「用民生主義代替社會主義」，並不是因為「民生主義」的目的和「社會主義」的目的有所不同，不，只是欲其在名稱上用「正本清源」的「民生主義」去代替不會「正本清源」的「社會主義」而已。因此並沒有把稱「社會主義」的主義的目的和使命與以否定，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認識。因此我們現在應該闡明「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精神，即廢除私有、實現公有的共產精神。固然，一方面我們還是要使人認識「社會主義」就是「民生主義」；但爲了宣傳計，一方面也應使人認識「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我們應該於使人認識「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之中去使人認識「社會主義」就是「民生主義」。

孫中山先生很懂得這點，他爲了宣傳，爲了說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不惜將就一般的見解而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與「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等語。根據這些，我們爲了提高民生主義的戰鬥性，應該喊出這樣的口號：

民生主義是中國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歐洲的社會主義！

惟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它不止適合於中國，也適合於一切の後進國。就這點而說，口號也可這樣：

民生主義是後進國的社會主義！

同時，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實踐範圍，似乎也未便把地球上的歐洲完全劃歸給它，雖一般的和主要的說來是在歐洲，但以其那裏也有落後的國家，反不如來個這樣的口號較好：馬克思主義是先進國的社會主義！

這話不過，現在一般人都把馬克思社會主義叫作共產主義去了，甚至乎「共產主義」名稱之上亦不冠以「馬克思」。雖然如此，但一談到「共產主義」，誰也不會想到別人的頭上去了，大家的腦海裏都不約而同的意識着「馬克思」三字。這是甚麼道理呢？原因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自它誕生之後，實行的社會主義都被其批判成空想的東西，於是它便獨霸了世界上社會革命的思潮。因為它獨霸世界社會革命的思潮成爲了事實，故談「社會主義」也用不着冠「馬克思」三字於其上。

現在既有了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它的獨霸性便已打破，我們免得混淆不清，頂好是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上冠以「馬克思」三字以別於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或民生主義的共產主義。依我的看法，對於民生主義也可以仿照「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稱謂名之爲「孫中山社會主義」或「孫中山共產主義」。數量講還是很有必要的。同時，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上冠以「馬克思」和孫中山的名號，亦可以表明兩種主義的特殊性，使人知道兩人的主義雖都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然而到底有「馬克

思』和『孫中山』之別。

至於民生主義是不定所以稱之爲『共產主義』呢？可以。因爲民生主義既是社會主義的本題，則在『社會主義』又可以稱爲『共產主義』時，那末作爲『社會主義』『本題』的『民生主義』又怎的不可以叫『共產主義』呢？實在，孫中山先生自己就在用這個推理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這是毫不可辯駁的。雖不應該知道『民生主義的大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夠共產』呢？人們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的『大目的』來稱呼他的主義爲共產主義，怎末我們就不可以用孫中山主義的『大目的』來稱他的主義爲共產主義呢？同樣可以，這是名正言順的事情！

依上面的論究，民生主義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也是中國的共產主義。既然，則民生主義的和平轉變方法怎的不是中國的共產方法呢？毫無疑義的是……

### 三 它的產生背景不止一個

我這種說法，在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性用以作爲自己所信仰的主義的理由和護符時，也許會博得共產黨人的喝彩吧？果然如斯，那就請莫高興早了！

因爲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雖然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但究竟是孫中山的而非馬克思的；目的固然相同，達到目的的方法却是絕對相反。爲甚麼彼此的方法會這樣絕對相反的呢？概括言之，是由於這些差別所使然，茲列舉如次：

第一個差別是：馬克斯共產主義誕生於先進國，孫中山共產主義誕生於後進國。所謂先進國即是指現存資本主義國家；所謂後進國，是指由封建到資本的過渡期或資本初期的國家。由於這第一個原因，於是又來了第二個差別，即前者是處在資本末期，後者是處在資本初期。由於這第二個原因，於是又來了第三個差別，即處在資本末期的，資本發達、生產過剩、分配不足、階級分明；處在資本初期的則完全相反，即資本貧乏、生產不足、分配懸寡、階級不明。因此，馬克斯共產主義和孫中山共產主義是在兩個不同的客觀條件之下反映成功的。用圖表出則是下面所示：



馬克思共產主義之反映背景

後進國  
 資本初期  
 私有貧乏  
 生產不足  
 分配悲寡  
 階級不明  
 孫中山先生共產主義之反映背景

馬克思共產主義，既然是在前圖所示的客觀條件之下反映成功的，那末，它要共產對於第一個條件自然是要摧毀它；對於第二個條件自然是要打倒它；對於第三個條件自然是要解除其生產桎梏；對於第四個條件自然是要平均分配；對於第五個條件自然是要剷平它。

但，這都不是和平轉變的經濟基礎，而是流血暴動的經濟基礎。因此，要實現理想社會便不能不用馬克思的共產辦法——階級鬥爭。

孫中山共產主義既是在後圖所示的客觀條件之下反映成功的，那末，它要共產對於第一個條件自然是要保持它；對於第二個條件自然是要節制它；對於第三個條件自然是要在國有的形式下充實它；對於第四個條件自然是要於生產過程中解決它；對於第五個條件自然是要於協作之中消弭它。

但，這都不是流血的經濟基礎，而是和平轉變的經濟基礎。因此，要實現理想社會不能不用孫中山先生的共產辦法——和平轉變。

這般分析的結果，我們該知道孫中山的共產方法和馬克思的共產方法是完全相反了，這種相反，是由於彼此所根據的事實相反的緣故。不錯，孫中山、馬克思兩人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但『目的』是中個抽象的概念，要使『目的』現實化，不能無實現那『目的』的具體方法。故共產主義科學與否，取決於其方法而不取決於其目的。我們談馬克思共產主義是科學的，是因為它有一套切合客觀需要的具體辦法，這具體辦法在意識範疇下來看，便是階級鬥爭論。它，對於由資本末期突進到社會階段有提綱挈領的作用；打倒資產階級、奪取生產工具實行無產專政，均非用這種精神不可。我們說孫中山共產主義是科學的，也是因為它有一套切合客觀需要的具體辦法，這具體辦法就是和平轉變；在意識範疇說來，便是和平轉變論。它，對於由資本初期漸進到社會階段，有提綱挈領的作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均非用這種精神不可。既然『主義』之科學與否，取決於其方法，那末，問題就很顯然：『主義』科學不科學，惟看方法科學不科學足矣；而方法之科學與否，又看它是不是根據客觀的事實出發以爲斷。

馬克思的共產方法是科學的，一般的社會主義者對之都無疑義。但對孫中山先生由共產方法，却不然了，對於它的科學性非常疑感甚至不信任。這個原因在那兒呢？就是由於他們要把不平衡的歷史弄得整齊齊的結果。因此，他們對於科學的共產主義祇承認有一個不承認有兩個，那末我說決定共產方法的事

實有準備，他們必然覺得奇怪了。

其實，這個一點也不奇怪，祇要他們能夠拋棄形式邏輯或機械主義，此中的真理，他便要磕頭下拜的。

他們覺得：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它怎樣可以反映出科學的共產主義呢？不大發展的事實，祇能產生出不完全理論呀！中國現在豈然是處在『不大發展的事實』中，就說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吧，但，理論之不完全，也是歷史的必然。既不完全，這種主義，那還能夠實踐，有科學性可言呢？

所以，他們對於我上面所列示的圖，一定是不滿意的。實際上，這個圖我也覺得不完全，有失民生主義的綜合性。因為那些事實都為國內的。雖說些這事實是真實的，然而在說明那些事實反映成孫中山共產主義時，還是非常不夠。不，簡直無法說明。先進國也曾走過我們這個階段，為甚麼他們不能想出思想預防的辦法呢？故知單以國內的事實作為構成民生主義的整個因素，對此疑問，便答覆不出一個真理來。但總不能答覆它，便把孫中山的和平轉變論推到空想的路上了。這那行？

孫中山共產主義是博大精深、無美不具的共產主義。他是民族主義者也是國際主義者，他是資本主義者也是社會主義者。其偉大就是他能看透一切，兼收並蓄，打破一切偏見，創造出一種至當不移而特殊的

共產主義。他能根據中國的落後國情，創造出一種共產的科學方法——和平轉變論，就是由於他能看透一切、兼收並蓄、打破一切偏見的證明。所以，我們說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根據中國國情之需要所創造出來的，固然不能說不對；但尤未能道出孫中山先生博大精深的所在。我們應知道，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用世界眼光看中國國情之結果。因此，這個主義不僅不與中國國情相衝突，也不與世界潮流相衝突；不僅不與世界潮流相衝突，而且有助於其發展。民生主義之能融合一切環境、拍節相應，就是因為它富有深厚、精微的國際因素所使然。這種深厚精微的國際因素，頭腦簡單、機械成性的人，都不能正確的理解出來。所以如把和平轉變論之產生背景理解作一個，那是不對的。詳細的理由，請看下節。

#### 四 它是兩個事實的綜合

孫中山先生說：「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學說，順應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又說：「本大總統觀察世界的形勢，默察本國的情形，以為實行『民族革命』。『民族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才可以免將來的經濟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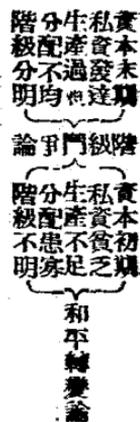
在這種眼光中所「觀察的世界大勢」與「世界潮流」是甚麼情形呢？他說：「就世界各國的情形而說，

現在國內最有秩序莫過於英國、美國。說到英國、美國的政治，雖然是很完善，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許多人常常發動革命」。就是說：「英美內都還有很大的問題。他們全國政權，表面雖說是在人民手裏；但人民彼此之間，把政權分得還不均勻。原因是由於他們的社會，有兩種絕大階級：一級是極大的富人，一級是極苦的窮人。富人財產過多，總是用資本的勢力操縱全國政權，來壓制窮人，多數窮人不情願受少數人的壓制，便想種種方法來反抗富人。那種窮人反抗富人的暴動，便叫做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原因，便是由於社會「貧富太不均」。這是他對於「世界大勢」的一般的觀察。原因在那裏呢？他說「就是由於古今的生產力不同」。於是他使用經濟學的觀點來追尋經濟革命的原因了。這種「生產不同」的大界限，就是實業革命。因為「外國之發生大資本家，是由於經過了實業革命。那種革命是把各種生產方法不用手工來製造，專用機器來製造。因為機器製造得很快，工廠的規模又大，出品很多，所以有機器的人便發大財，便生出了許多大資本家。大資本家有了錢於是無惡不作」，社會因而便有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立！因此，他結論說：「歐戰發生了之後，社會進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經到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時期」。

但英美那些國家，爲甚麼不能防患在先呢？原因是他們看不到這樣遠，那時，「許多的革命同志，以爲政府改良，弄到國家富強之後，便沒有甚麼問題了」。在孫先生談到「經濟發達，土地受影響這種變動

一時，也覺得認識此種變動的前因結果，須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之後。所以他不像梁啟超那樣，看見貧富懸殊，階級鬥爭的情形便叫出『歐洲文明破產』的呼聲。他不以為奇，因為他知道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首先不及『思想預防』，『關於今日的經濟革命，在孫中山先生固覺太不經濟，然並不以為絕望了，那些國家的『民生問題』還是有解決的時候，且『爲階級鬥爭是一個解決的辦法。這由於他不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是人類理性的社會。在他，最理性的社會，是共產社會，但他也不主張根本反對發達資本之舉。不過，須吸取教訓，不再走私人資本主義的道路罷了。他雖主張共產，但不主張飛躍，所以，他不是感情主義者或貧窮的社會主義者；他雖主張發達資本但不主張步歐美の後塵，所以他不是現實主義者和機械主義者。他這種綜合的、兼證的觀點，完全是國際因素作用於中國國情之結果。用他自己的話，即是『察世界大勢觀察本國國情』之結果。這是一來，中國由資本階段到社會階段，就是一個和平轉變的姿態了。因爲這種關係，所以和平主張把共產主義分作和平轉變論的與階級鬥爭論的兩種。換言之孫中山的叫和平轉變的共產主義，馬克思的叫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

和平轉變論既然是國際因素作用於中國國情之結果，則要表出這種關係，圖式便應該如下：



圖式雖然作出了，但不能不說一下。前面所謂國際因素。主要的是指資本主義未期的社會現象；因為只有在這個階段的事實才能刺激落後國與它以警告、引以為借鑑的。而在這個期間，階級對立的事實掩蓋一切，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是到了一個社會革命的時期。而國際間的階級鬥爭事實特別尖銳的時候，階級鬥爭論亦已同時反映成功了。因此，所謂國際因素，還不僅指階級鬥爭的事實也指階級鬥爭的理論。實在，有了階級鬥爭論，反轉來更使我們特別看得清階級鬥爭的事實。這即是說，階級鬥爭論，尤其是揭發階級鬥爭事實之根源的資本論，更有助於我們和平轉變論之創造與成功。由這一點而看，我們很可以說，階級鬥爭論是和平轉變之母。

關於孫中山先生的研究態度，他是很客觀的，這種客觀的對象有兩個：一個是歐美的，一個是中國的。據詳細的說，民生主義（整個的三民主義都是如此）是以歐美事實來作為根據中國事實的「根據」的綜合的主義。

馬克思所謂根據事實，是根據歐洲的事實，是站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再根據其他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的事實；孫中山所謂根據事實是根據中國的事實，是站在資本落後的中國再根據歐美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的事實。這是一個不同之點，我們應該把握這個不同之點。否則，光在「根據事實」之抽象的和一般的詞句上來舞文弄筆費唇舌，那是鬧不清楚的。我們應該認清，事實有單純的與綜合的之分，而馬克思所根據的事實，則是單純的，就說他曾綜合過，然而也還是綜合同階段的事實和理論。孫中山則不然，他所根據的事實是兩個絕不相同的階段。換言之，他所謂根據事實，是根據兩個不同的階段的事實——相反階段的事實，所以這個綜合是一個正反的綜合。如左圖：

歐美先進事實——中國後進事實——民生主義。

甚麼是歐美先進事實？「已發」的階級鬥爭事實；甚麼是中國後進事實？「未然」的階級鬥爭事實。竊觀這裏，我想引點文獻來證明我這個看法之正確。

孫中山先生說：「我們提倡民生主義……爲思想預防，及今不圖後將爲患，故衛生之與療病，自亦不同，一則防患於未然，一則治之於已發也」。不論話中所謂「治之於已發」，是指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尤其是民權，一般說來是資本階段的東西，是從封建勢力中爭取過來的。中國的封建勢力，已有數千年

的歷史，根深蒂固，用孫中山先生形容歐美階級爭鬥的話，則是『積重難返』。對於這『積重難返』的勢力，自不能不用流血暴動的革命手段來解決之。故其謂『治之於已發』云者，也便是這個意思。現在我要借用這個邏輯用到解決歐洲階級鬥爭的事實上去。不過，這也還不是『借用』。孫中山自己就曾有這個意思，即階級鬥爭的共產辦法；有『治之於已發』的階級鬥爭事實的作用。這個意思並且很明顯，他曾說：解決民生問題，『凡是資本已經發達了的國家，現在都沒有好辦法，中國此時的資本還沒有發達，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趕緊設法來防備，免得再蹈歐美的覆轍』。甚麼才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好辦法』呢？即『思患預防』的民生主義。甚麼是『歐美的覆轍』？即『階級戰爭』的社會革命。歐美因為『從前不講民生主義的原因』，階級鬥爭已『為患』於今日了；但此患已來，也就不得不用『治之於已發』的方法去解決它了。孫中山先生不是悲觀主義者，患『未發』固主張『思患預防』；患已發，也絕不逡巡猶豫，他主張『在不均的社會……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就是這個道理。

## 五 它以『思患預防』為內容

從而我們知道，所謂『思患』，是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防患』的和平轉變論之科學性

也便在這裏立其基。而孫中山先生「默察本國國性」一語，也就是指中國「未然」的階級鬥爭事實。他知道利用這「未然」的階級鬥爭事實去「防患」。去「免除將來的經濟革命」，這就是國際因素作用於中國的結果。沒有這個國際因素，中國一定也會同歐洲一樣，「以爲政府改良；弄到國家富強之後，便沒有甚麼問題了」的。因爲在資本主義初期的國家，歷史法則尙屬是「深藏」的，你不會注重到它，也料想不到它。故中國之得以在資本初期就來防止它，這正是先進國「已發」的階級鬥爭事實之賜。「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的和平轉變論，還不能說是有深厚的歷史根據嗎？實在，這便是孫中山先生共產主義科學的原因，這便是孫中山先生的和平轉變是科學的共產方法的原因，和平轉變的理論基礎，是「思患預防」。所謂「防患於未然」，意思就是防止階級鬥爭、防止社會革命於未來。那末，將來中國進到社會階段，自然就是和平轉變的了。這便是我們把孫中山的共產方法，名之曰和平轉變方法；在與階級鬥爭論對稱時，又叫做和平轉變論的原由。孫中山先生的「一次革命論」就是這個邏輯的開展。故他說：「我們革命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來革命。革命要用澈底的方法，才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這可見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和平轉變的共產主義者了。

所以和平轉變論是孫中山先生的創見，其構成關係如次：

已發的階級鬥爭事實——未然的階級鬥爭事實——和平轉變論

我們把這種關係弄清楚了之後，再來讀孫中山先生下面這段話，就更覺明白無遺了。他說：『歐美經濟之患在不均，不均則爭；中國之患在貧，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則仍不免於爭；故思慮預防，宜以歐美爲鑒，力謀社會經濟之發展，及關於社會經濟一切問題，同時謀適當之解決。』

『中國之患在貧，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這話，一般說來，是繼承資本主義的精神；『宜以英美德爲鑒，力謀社會經濟之發展』，這話，一般說來，是接受社會主義的精神。但，典型的資本主義，是私人資本主義，典型的社會主義，是無產專政的社會主義。這兩個主義是不能同時並行的要實現它們，需要兩次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孫中山先生是能『洞觀』一切的，覺得資本主義的『發財』精神還是可嘉，可是富而不均，鬧成爭鬥，却又宜引以爲鑒。這一『鑒』就使得孫中山先生覺得社會主義的『均分』精神之可嘉。這樣一來，他就走上綜合的路上來了。資本主義的『發財』精神我所欲也；社會主義的『均分』精神亦我所欲也，用孟子的形式邏輯，必然是『二者不可得兼』，惟有『舍』一與『取』一了。實在，今日許多所謂社會主義者，就完全爲孟子此種形式邏輯籠罩住了。孫中山先生却不然，他雖盛稱孔孟之道，但在

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取捨上，他却要說『二者』可『兼』。這可以說，他處處都在用奧伏赫變的精神以處理一切問題呢！恁末『兼』法呢？一方面主張『發財』，一方面主張『均分』。要『發財』不礙到『均分』，便要拋棄資本主義的私有性，昂揚社會主義之公有性，使『假富』變成『真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便是昂揚公有的消極方法；國營實業，舉辦合作，便是昂揚公有的積極方法。要『均分』不礙到『發財』，便要拋棄社會主義的鬥爭理論，昂揚社會主義的協作精神，使『人民對於國家……盡足國民之義務』，既人人爲享受分子又『人人爲生產分子』。總之，孫中山先生既主張『富』又主張『均』，『句話，要『富而均』。資本主義側重富，共產主義側重均，由富到均的當中須有一個流血暴動而革命。中國現在既不富也不均；既不均也不富。說是有『富』者也好比是先進國中的『小貧』；說是有『貧』者，也好比是先進國中的『大貧』。在歐美，『大貧』固不是社會革命的，『小貧』也一樣的不是社會革命的對象；歐美社會革命不把『小貧』當作對象，我們行社會革命則把『小貧』當作對象，而且是唯一對象，這恁末對呢？這樣的社會革命，豈不是把先進國的革命者當作被革命者去了嗎？不曰滑稽亦滑稽矣！

所以中國的不均，是『大貧』『小貧』的不均，用歐美來比較，不過是被壓迫階級中的不均而已。自然，我們不是說中國毫無資本家，有，但很少，少到得不成其爲階級。抗戰中，私人資本多受打擊，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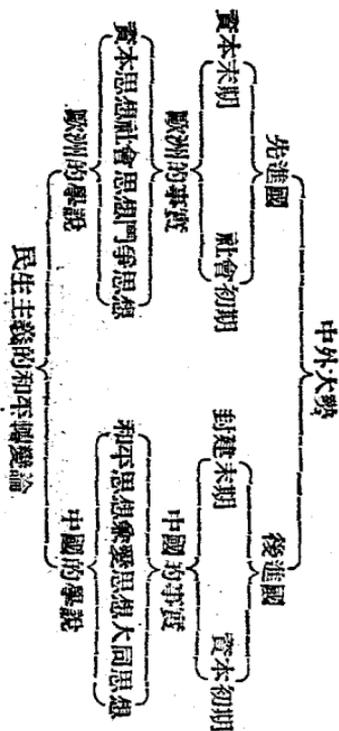
資本有壓倒一切之勢，如不以中國之『小貧』作流血暴動之對象，成甚麼階級鬥爭呢？

孫中山先生看到這層，故利用這大貧小貧的社會情形作爲致富、均分的和平轉變論基礎，把兩次革命在一次革命中完成它，這是很有見識的。

文章得到了這裏，我們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和平轉變論應該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了。

甚麼是和平轉變論？它是孫中山先生外觀歐美『已發』的階級鬥爭事實，內察本國『未然』的階級鬥爭事實而釀成的和平轉變方法或和平轉變論。詳細些說，和平轉變論是孫中山先生用國際間資本社會末期的事實及反映那事實之理論作『根據』再來根據本國的事實和固有的理論而創造出來的和平轉變論。反之，也可以說是這樣說：和平轉變論是孫中山先生用中國資本初期的事實及固有的和平、兼愛、大同等理論作『根據』再來根據國際的資本末期的事實及反映那事實的理論而創造出來的和平轉變論。其關係如次

圖：



這才是「三民主義」誠不僅民主主義爲然——洵是集合古今中外學說，順應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語的解釋」也才是三民主義爲「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審世界之潮流，兼收衆長，益以新創」——「語的解釋」！

這便是孫中山先生的和平轉變論的綜合的反映過程或創造過程！不懂得這些，那是永遠不會窺見和平轉變論或和平轉變的民主主義的全貌的！

而我們所闡揚、所主張的和平轉變論，便是此種民主主義的和平轉變論；我們認爲中國由資本到社會

之和平轉變，也祇是此種民生主義的和平轉變！

一九三九，一，十一於重慶南岸。



11-275

中華民國廿九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再版

### 三民主義研究

著者 張 鈞 中

出版者 時代 思 湖 社

印刷者 中國合作圖書印刷所

地址：秦和上田碼頭

總經理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

江西分社（泰和）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圖字第一二七〇號

C  
3.0-53